



《学点历史》丛书

世界古代史上阶级斗争 和路线斗争的几个问题

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人理论组 编写
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73级工农兵学员

《学点历史》丛书

世界古代史上阶级斗争和 路线斗争的几个问题

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人理论组 编写
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73级工农兵学员

人民出版社

《学点历史》丛书

世界古代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几个问题

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人理论组编写
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73级工农兵学员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25印张 65,000字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1001·295 定价 0.26元

恩格斯语录

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出版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学习历史，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当前学习的需要，将分册出版。

目 录

罗马共和制到帝制转变时期的阶级斗争和 路线斗争.....	1
西罗马帝国衰亡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	21
封建社会初期地中海地区一场复辟反复辟 斗争.....	41
日本大化革新与中国法家思想.....	61
日本封建制是在激烈的反复辟斗争中确 立的.....	77
论古代世界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斗争.....	97
古代世界“尊天命”和“反天命”的斗争.....	110
后记.....	128

罗马共和制到帝制转变时期的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在古代世界历史上，罗马奴隶制共和国到奴隶制帝国的转变，是一场长期、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这时期出现了马克思称颂为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①的斯巴达克，他领导的伟大奴隶起义震撼了奴隶社会的根基；也出现了恩格斯称为“**伟大人物**”^②的恺撒和奥古斯都，他们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由共和到帝制的转变。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和迂回曲折、激烈反复的路线斗争，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要内容。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将有助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

(一)

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共和国已存在了四百余年。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第159页。

^②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下同)第四卷，第507页。

在这长时期中，罗马从一个小小的奴隶制城邦国家，逐步地吞并了意大利半岛，又先后征服了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变成了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奴隶制霸国。与此同时，罗马的社会经济也发生了变化。奴隶制进一步发展，土地大量集中，商业高利贷资本形成，从而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除了原来的元老贵族、平民、奴隶外，这时还出现了专营金融业的骑士和外省奴隶主集团，促使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更形复杂化、尖锐化。

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在奴隶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一小撮元老贵族奴隶主。他们通过向外扩张，掠夺到大量的奴隶和土地，并且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组成了奴隶制大农庄。罗马历史家阿匹安曾概括地记述这一过程说：“(元老)富家占领了这未分配土地(即罗马掠夺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当时名为“国有地”——引者)的较大部分，并由于占夺的年深日久而指望不再从他们手中拿回去，他们开始把相邻的贫人的土地并入自己的领地，部分是用钱从他们那里买到的，部分则是用强力夺取的，以致在他们手中的终于不再是小块的地产，而是巨大的田庄了。为了耕种田地和保护牲畜，他们开始购买奴隶……这样一来，强大有力的人物便大发横财，而国内到处都是奴

隶”。^①

元老贵族的大农庄，主要分布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北非等地，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剥削奴隶十分残酷。白天让他们带着镣铐干活，夜晚关入地牢，饮食恶劣，不得一饱。西西里岛有的奴隶主，甚至不给奴隶衣食，让他们在大道上行劫谋生。对奴隶随意拷打、折磨致死，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奴隶的反抗斗争，首先要打击的就是这些元老贵族。

这种奴隶制大农庄是靠榨取奴隶的剩余劳动以至必要劳动，靠牺牲大量奴隶的生命来维持的。虽然它的发展不断排斥中小奴隶制庄园和小农，但它的生产水平比后两者都要低。罗马小农是自由的自耕农民，对生产劳动有比奴隶高得多的主动性。中小奴隶制庄园典型的是如加图在《农业志》中所描写的那样，占有一百——二百犹格^②土地，使用十几、二十个奴隶。这种农庄便于监督劳动、经营管理，又能组织简单协作，生产效率也比奴隶制大农庄高。因此，奴隶制大农庄是落后的势力，不利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经济上对土地和奴隶的垄断占有，反映在政治上，

① 阿匹安：《内战记》（罗布古典丛书，一九一三年伦敦版），I, 7。

② 犹格：罗马土地面积单位，一犹格约合我国四亩。

便是元老贵族对政权的垄断。这时罗马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共和制度。人民大会(特里布斯会议、百人团会议等)仍然保留,它的职权是表决国家大事和选举各级行政官吏,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权力。国家决策机构是元老院,它广泛讨论内外政策、和战方针,提出议案,交由人民大会表决,而后由执政官等执行。元老院由三百名元老组成(后来增至六百名),只有担任执政官等的高级官吏退职后始得充任元老,而一进入元老院就可终身任职,享有很大特权。元老、执政官等往往为少数显贵家族垄断。^①他们拥有巨额财富,豢养着大批食客、帮闲、游民,选举表决时收买选票,公行贿赂,直至大打出手,以压倒对方,保证自己的特权地位。共和国除意大利外还统治着广大的行省地区,派总督管理,行省总督只有一年一任的执政官退职后始可充任。在罗马奴隶主眼中,行省是被征服地区,没有一定管理制度,总督可以滥征重税,多方剥削。因此,对行省的榨取实际上也是这少数元老贵族的特权。由此可见,共和制度是保证少数元老贵族经济特权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也是过时落后的东西。要反对元老贵族,必然要

^① 据统计,公元前二三四年到一三三年的一百年中,两百名执政官有一百五十九名出身于二十六个显贵家族,其中有的家族先后出任执政官二十三次。其他担任过执政官的贵族也属于元老集团。

动摇保证他们统治的共和制度。

除了奴隶群众反对元老贵族之外，广大的罗马小农也和元老贵族有尖锐的矛盾。小农是自由的自耕农，平时务农，战时参军，这种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是“**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①而小农又是罗马军队的基干，是罗马国力强盛的根本保证。由于土地的兼并、战争的破坏、奴隶的大量使用、大农庄的排挤，越来越多的小农破产了。元老贵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的小土地所有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是导致小农反对元老贵族的政治斗争的主要经济根源。因此，马克思说：罗马“**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具有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特殊形式。**”^②

在奴隶主阶级内部，中、小奴隶主由于受到元老贵族的排挤，也和他们发生矛盾。特别是各行省的奴隶主，还没有获得罗马公民权，既不能去占用国有土地，又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经济上还要负担极为沉重的捐税，更对元老贵族不满。同时，随着商业、高利贷的发展，奴隶主阶级中兴起了新的富有阶层——骑士，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71页注(24)。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3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第438页。

他们靠经营商业和高利贷，包揽税收等而发财。他们虽在金融经济方面占有统治地位，在政治上却没有实权，因此反对元老寡头独揽大权，是元老贵族统治的一个劲敌。

由此可见，元老贵族奴隶主集团在当时已成为众矢之的，是一切进步势力打击的主要对象，而为元老贵族服务的共和制度也就变成意大利和整个地中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和障碍，反对元老统治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取消共和制度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必然是逐步改变元老垄断政治经济特权的局面，对上层建筑作一些改革以有利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表现为把元老控制的共和制转变为帝制。

在这一转变中，奴隶的反抗斗争、伟大的奴隶起义是决定性的推动力量，而奴隶主阶级内部改革派反对元老贵族保守派的斗争，也起了应有的作用。改革派代表着骑士、外省奴隶主和中、小奴隶主的势力，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经过长期斗争，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取得胜利，夺得了政权。这百余年惊心动魄、尖锐复杂的斗争过程，为说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二)

从公元前二世纪后期起，罗马历史上就不断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奴隶起义。公元前一三七年，在号称“罗马谷仓”的西西里岛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二十万人，他们惩办了罪大恶极的奴隶主，没收了奴隶主的大农庄和粮食，占领了许多重要城市，建立了奴隶政权。起义大军不仅消灭了八千名西西里地方军队，而且多次打败派来镇压奴隶起义的罗马军队，坚持斗争五年之久。元老贵族费了很大力气，方才镇压了这次起义。

奴隶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元老贵族，促进了奴隶主内部的分化，使奴隶主中较低阶层的一部分人看到了危险，谋求改革，于是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运动，这是改革派斗争的开始。

提比略·格拉古出身贵族，他看到由于土地兼并破坏了小农经济，削弱了罗马的军队；奴隶起义又给统治阶级造成很大威胁；认为必须限制土地兼并，保护小农，才能稳定奴隶主的统治，为此必须向元老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发起进攻。公元前一三三年，格拉古任保民官，提出了一个土地法案，规定每个大土地所有

者占有土地最多不能超过一千犹格（约合三千七百五十亩），多余土地按三十犹格一份分给农民，不准出售。这个法案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同时也遭到元老贵族的疯狂反对。元老贵族最初企图利用另一个保民官行使否决权来撤消法案。格拉古利用小农的支持撤消了那个保民官的职务，给元老贵族以迎头痛击，使法案在人民大会上通过而成为法律。这是对元老院垄断的政治特权一个很大的打击。元老贵族恼羞成怒，凶相毕露，纠集死党，袭击改革派，杀害了格拉古等三百余人。土地法的实行由此受到很大阻挠。

十年后（公元前一二三年），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再次掀起斗争。为了结成广泛的联盟，他除了提出土地法外，还提出给意大利人以公民权、^①给骑士以审判权等更广泛的改革法案。后面这一条对元老的政治特权也是一个冲击。因为过去只有元老才有审判权，法案却要增加和元老同等数量的骑士来分享这项特权。这次改革运动仍然遭到元老贵族的反对。他们出动武装力量，镇压了改革运动，杀害盖约·格拉古和他的支持者三千多人。

^① 罗马公民权为罗马城邦自由民专享，意大利和各行省的自由民都没有公民权，被剥夺了很多政治、经济权利。公民权问题也是当时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从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出发，想对元老贵族的经济政治特权加以一定限制。但他们企图用合法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说明改革路线还很不成熟。而元老贵族绝不会自动放弃他们一丝一毫的特权，他们的势力还相对强大。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次改革只能归于失败。

在格拉古兄弟改革十几年之后，出现了马略的军事改革。他不顾元老贵族的反对，把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建立了职业军。从此，凡自由民不论财产资格都可志愿应募入伍，服兵役十六年，由国家供养，退伍后还可分得土地，有利于小农土地问题的解决。由于实行了军事改革，改革派开始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为开展军事斗争准备了条件。

公元前一〇四年，富有革命传统的西西里岛又爆发了第二次奴隶大起义。起义军勇猛作战，捣毁了奴隶主的军政机构、仓库和驿站，两次大败罗马军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奴隶主被迫龟缩在少数几个城市里，惊恐万状。罗马奴隶主花费了四、五年的时间，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军队，才把起义残暴地镇压下去。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又一次动摇了奴隶主的统治，大大削弱了元老贵族的实力，为改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之后，改革派的斗争重新高涨起来。这次斗争的中心是双方通过争夺军权，展开武装斗争。

马略进行军事改革之后，破产小农大量受募当兵，服役期满，则要求分配土地，于是小农的土地问题便以如何分给退伍老兵以土地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出来。同时，由于士兵都变成受雇的职业兵，他们只要能得到优厚的薪水和战利品，并保证退伍后能分到土地，便为其统帅效忠，所以军队很容易成为统帅手中的工具。不管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努力建立一支为自己服务的军队，以求战胜对方。

公元前一〇一年，为了给马略老兵以土地，改革派提出了一个法案。这一法案虽然在马略老兵的拳头的支持下得以通过，但由于改革派内部发生矛盾，导致改革失败。到公元前八十八年，改革派又展开了一场大斗争，想剥夺元老院授予保守派苏拉的统帅权，自己掌握军队。苏拉进行反攻，于是酿成改革派秦纳、马略（还有他的儿子）和保守派苏拉之间的内战。起初改革派得胜，建立了第一次军事独裁。镇压了许多元老贵族，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解决意大利人公民权问题，废除债务四分之三，取消元老贵族的一些反动法令等。不久苏拉反攻倒算，打败改革派，又建立了保

守派的军事独裁，对改革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大约一千三百名骑士被判处了死刑；并把所有要处死的人列入名单，公布于众，一经拿获立刻就地杀死，被夺去生命的将近五千人。还有些人被放逐，另一些人财产被没收。同时颁布了许多反动法令，恢复了元老院的一切权利和特权。以前改革运动的成果被消灭殆尽。

苏拉反动独裁的暂时得势，说明改革派还没有巩固地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在军事斗争中又被势力还显得一时强大的元老贵族所压倒。但是，反动派的猖獗是决不会长久的，奴隶起义的伟大浪潮，终将扫除这些障碍，把改革运动再次推向前进。

(三)

斯巴达克起义于公元前七十三年爆发，当时苏拉派的元老反动统治已经延续十年，整个意大利处于最黑暗的时刻。斯巴达克起义就如震天霹雳，彻底动摇了元老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写下了古代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斯巴达克原为色雷斯(现今保加利亚南部一带)人，在反抗罗马侵略的战争中被俘为奴，后又被送到奴

隶角斗士训练班。斯巴达克在角斗士训练班遭受的血腥折磨，使他极其鲜明地发出了奴隶革命的号召：“坚决为自由战斗”。^①他把训练班的奴隶组织成一支革命的队伍，拿起武器，冲出牢笼，在附近的维苏威火山建立了第一个起义据点。

起义发展极快。南部意大利星罗棋布的奴隶制大农庄里的奴隶群众，立即闻风而动，大批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有些破产小农也投奔起义队伍。原来只有几十人的起义队伍，很快就扩展为一万多人的革命大军，控制了南意大利平原。罗马元老院虽然派了军队前堵后截，起义军却是每战皆捷，不仅大歼敌军，而且使起义队伍扩展到十二万人，声威大振。“现在罗马元老院忧虑的已经不仅仅是这些奴隶暴动的不体面的耻辱了。它惧怕斯巴达克，并且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有如面临一场极艰巨的战争。”^②

在两年多的胜利进军中，斯巴达克领导起义队伍转战整个意大利半岛，多次击溃了罗马奴隶主的军队。起义军沿途所到之处，解放了奴隶，摧毁了元老的大农庄，镇压了大奴隶主，建立了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涤荡腐朽污浊的历史功勋。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斯巴达

① 阿匹安：《内战记》，I, XIV, 116 页。

② 普鲁塔克：《克拉苏传》第九节。

克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予很高评价。马克思称颂他具有“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①列宁指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在许多年间，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②

斯巴达克起义最后虽然不免于失败，它对于罗马奴隶社会的冲击和整个罗马历史的推动，却是异常深刻的。这次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奴隶起义，特别沉重地打击了元老贵族，使这个最反动的奴隶主势力在政治经济上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南部意大利一直是元老的奴隶制大农庄密集之区，起义就从这儿爆发和扩展，因此，这些大农庄受到致命打击。起义以后，南部意大利的奴隶制长期处于衰败之中，元老贵族剥削奴隶的一个重要地盘被奴隶起义砸碎了。不仅南意大利的元老大农庄受致命破坏，起义军在整个意大利南征北战的过程中，也对意大利各地的奴隶制经济给予沉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第159页。

②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下同）第四卷，第50—51页。

重的打击。起义之后，到处出现庄园残破、奴隶稀少、奴价高昂的现象，而奴隶群众采取怠工、破坏工具和逃亡等手段进行反抗的情况也更为频繁和激烈。由于斯巴达克起义从经济上如此沉重地打击了元老贵族势力，才使以后改革派的斗争能够取得胜利。

斯巴达克起义在政治上对元老贵族的打击也很厉害。嚣张一时的苏拉派元老贵族专政在奴隶起义的打击下惊惶万状，不可终日。起义大军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战胜当权的元老派军队，不仅使元老贵族损兵折将，而且严重地破坏了罗马各级政权机构，使元老贵族政权陷于瘫痪。奴隶起义大小数百次的战斗，打败和消灭了十余万罗马官兵，罗马国家的最高头目——执政官也多次成为斯巴达克的手下败将。因此，当公元前七十一年，罗马政府准备选任一名司令官出来和起义军作战时，那些完全被起义军的声威吓呆了的元老政客就一反过去你争我夺、贿赂收买的丑态，而是“恐惧笼罩了所有的人”，“谁也不提自己为候选人”。^①斯巴达克起义既然如此剧烈地震撼了元老贵族的反动统治，也就在客观上为改革派东山再起提供了机会。在斯巴达克起义之后，改革派就趁着元老派大受打击

^① 阿匹安：《内战记》，I，XIV，118。

的时机,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于是出现了恺撒和屋大维的改革。

(四)

斯巴达克起义之后,元老势力一蹶不振,改革派乘机活动。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刽子手克拉苏,原是一个苏拉派,这时也迫于形势而看风使舵,对苏拉原来搞的那套反动措施表示不满,大有迎合改革派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克拉苏和另一个军官庞培当了公元前七十年的执政官,并应改革派的要求而取消了苏拉派的反动立法,恢复了保民官的权利,从元老院中清洗了六十名最为人民痛恨的苏拉党羽,把元老独占的法庭审判会改为由元老、骑士和中等奴隶主平均组成。这些变化,生动地说明了在斯巴达克起义冲击之后,元老势力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当然,元老贵族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改革派要取得最后胜利仍须进行长期的斗争,但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元老统治及其共和制必然灭亡,却是不可抗拒的了。因此,经过十年之久的激烈斗争,到公元前五十九年,改革派领袖恺撒终于上台担任了执政官。恺撒总结了改革派前几次的经验教训,在和保守派的斗争中,坚决把建立一支可

靠的、优良的军队作为首要任务。他在高卢任总督近十年之久（公元前58—前49年），多次和日耳曼人作战，获得了大量战利品，使他可以对士兵进行丰厚的犒赏，并且收买自己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长期战争训练出一支有作战经验、装备良好的军队，也锻炼出恺撒的军事指挥才能。公元前四十九年，恺撒率领他在高卢组成的强大军队进逼罗马，大败元老派的军队。次年，在法塞拉斯战役中，恺撒又击败已成为元老派主要将领的庞培，取得胜利。

恺撒战胜庞培以后，就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措施，一方面大力扶植意大利和各行省的中小奴隶主，另一方面则大大削弱元老贵族。他本人担任无限期的独裁官和终生保民官，冠以“元帅”和“祖国之父”的称号，大权独揽，实际上成为第一个罗马皇帝。然而，恺撒毕竟是一个奴隶主阶级改革派的政治家，他不可能对元老贵族进行坚决彻底的打击和镇压，也不可能在自己身边肃清元老派的残余。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元老反动势力乘机活动，大搞阴谋破坏，恺撒终于在公元前四十四年被阴谋分子刺死。恺撒死后，改革派的事业由他的养子屋大维继承下来。屋大维组织改革派力量，经过长期流血斗争，打败了阴谋复辟的元老派，再度确立了军事独裁政权，罗马帝国时期从此开始（一般以公

元前二十七年屋大维获“奥古斯都”^①称号为标志)。

在恺撒和奥古斯都建立的政权中，原来的元老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被取消了。恺撒当政时已对元老院进行较全面的清洗，并把大量的改革派人士，包括意大利和各行省的中小奴隶主补充进去。同时剥夺了元老院掌握的军政实权，使它变成一个装饰品。奥古斯都进一步贯彻了这些措施，他一方面在反对元老复辟的激烈战争中较彻底地镇压了原有的元老贵族，^②另一方面又多次清洗元老院。因此，在他统治后期，六百名元老中属于共和时代的旧元老世家已寥寥无几，这个阶层实际已被消灭。在帝制之下，奴隶主阶级中的较低阶层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如奥古斯都大量赐给外省人以罗马公民权，这些人大都是中、小奴隶主，他们担任了帝国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吏，其中担任高级官职的人还可获得元老称号。原来元老垄断行省总督的情况也被取消，由皇帝委任奴隶主较低阶层人士管理行省。随着这些变化，罗马帝制政权真正成为帝国各地奴隶主阶级共同的专政机构。

在经济方面，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改革措施，主要表

① “奥古斯都”，意为“神圣”、“崇高”、“庄严”。

② 公元前四十三年，改革派在罗马镇压了三百名元老，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以后的战争中也有大量元老贵族被镇压。

现在扶植中小奴隶主和发展行省经济等方面。他们都注意改善行省管理，由于元老特权被取消，行省行政得到加强，对贪污勒索的惩办也比共和时期严厉。同时逐步改善行省税收制度，注意减轻负担。特别是恺撒和奥古斯都大力推行的提高行省自治市地位的政策，使许多城市有权征收税款，经营产业，利于经济发展。恺撒还采取了扶植意大利和各行省中、小土地所有者的政策。早在他任执政官时，就提出了土地法，把国家掌握的土地分给两万名退伍老兵和贫穷公民。后来他又采取在各行省建立移民地的方式，使八万老兵获得土地，并把移民地提升为自治市。奥古斯都进一步推行这种政策，除了把没收过来的元老贵族土地大量分配给自己的士兵外，还在意大利和各行省大规模地建立士兵份地移民区。据统计，在意大利就有二十八个移民区，约有三十万老兵分得份地，每块份地面积先后虽有差别，但大致等于一个中等奴隶主所有的土地。^①除意大利外，奥古斯都还在欧洲、北非和东方各行省中设置了四十个左右的移民区，大量退伍老兵由此分得份地，总计在奥古斯都时约五十万老兵得到土地，他们使用奴隶劳动经营自己的土地，并在所在地区的市镇

^① 例如，在公元前四十三——前四十二年的土地分配中，每块土地合二百犹格，即五十公顷。

取得免税权和其他政治权利（如担任自治市议会议员和行政官吏等），构成帝国政权在各行省的重要社会支柱。

综上所述，可以明显地看出，罗马共和制到帝制转变的实质，就是取消元老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打破他们对社会发展造成的障碍，把历史推向前进。这一转变是经过一百多年反复曲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才完成了的。虽然奴隶主阶级改革派在这一转变中起了一定作用，但它的根本动力，还是伟大的奴隶起义。

是伟大的奴隶起义冲破元老贵族统治下“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促成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才出现了改革派的斗争。在这一段历史中，三次奴隶起义，紧跟着三次大的改革斗争，一次强似一次，一浪高过一浪，最生动地说明了这点。

是伟大的奴隶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元老贵族，才使改革派的斗争能取得胜利。改革派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一派，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能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敢于向元老贵族的经济、政治特权挑战，在斗争中不断发展自己的路线，执行一些进步的政策，以利于经济发展。但他们毕竟是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家，他们改革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巩固奴隶制，而这时的奴隶制又

已经不是处在生气勃勃的上升时期了，因此，他们反对元老贵族的斗争就存在着许多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很容易使改革走向失败。如果不是奴隶起义从经济上打击了元老，削弱了大地产，那改革派的斗争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这再一次地说明了，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主人。

西罗马帝国衰亡时期 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

(一)

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在奴隶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非常尖锐，奴隶制已经过时，奴隶制经济日益衰败没落。农村凋敝，城市破产，许多原来比较繁盛的矿山、作坊纷纷停业，无法维持。宫廷，官僚体系，军队都在不断地扩大，这时已变成了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日益加重赋税，更为残酷地剥削奴隶和其它劳动人民。政治上混乱腐败，统治阶级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展开血战。人民反抗的怒涛震撼各地，席卷全国。罗马帝国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罗马奴隶制的危机，突出地表现在城市制度的衰落上。罗马本来是一个奴隶制城邦，扩张成为一个大帝国之后，它按照自己的模型在东西部各地建立了许多城市。城市的统治阶级是中等奴隶主，他们占有土

地和奴隶，组成庄园，进行剥削。城市奴隶主的土地实际上已经是他们所私有的，但这种私有制“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①按照古老的公社原则，土地属于城市，城市对它仍有一定权利。例如，许多城市土地禁止出售，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出售。如果这种土地两年没有耕种，则任何一个城市公民就可以要求占有它。另外，还有属于全体城市居民共同使用的森林、牧场等等。马克思曾经把这样一种所有制形式称作“积极公民的一种共同私有制”。^②它起源于公社共有的原则，但在奴隶制之下，却发展为保持奴隶主内部团结、以共同镇压奴隶的反抗的一种手段。

在政治上，这种城市是所谓自治市，组织形式类似罗马城邦，有人民大会，元老院（即市议会），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等等。中等奴隶主是市议会议员，属城市贵族，另外还有许多小手工业者、农民等是城市平民。市议员负责管理城市财政，收缴赋税，分配所负担的各种徭役，以从中渔利，欺压下层居民。许多市议员也仿效罗马元老贵族那样，把自己剥削的钱分一部分为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页。

② 同上。

市大搞建筑，修起豪华的澡堂、戏院，举办宴会及各种娱乐，发放粮食等等，以收买人心，贿取选票，捞取更大好处。

随着所谓“罗马化”的进行，帝国境内兴起很多这样的城市，它成为罗马奴隶主剥削与镇压奴隶的据点，是罗马帝国的支柱，罗马帝国头两个世纪的相对稳定和繁荣就奠基在这些城市的繁荣上面。

但是，从三世纪开始，这种城市制度急剧地衰落下去，表现为奴隶制庄园的瓦解与市议会议员的大量减少。这首先是因为，随着奴隶制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奴隶主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对奴隶们的剥削越来越残酷，压迫越来越厉害。奴隶们为了反对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从逃亡，怠工，击杀奴隶主和破坏工具，虐待牲畜等，直到武装起义。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使奴隶制庄园维持不下去了。另外，随着罗马军队战斗力的衰败，大规模侵略战争被迫停止，奴隶来源减少，奴隶价格昂贵，奴隶制生产也不再有利可图。

与此同时，奴隶制的寄生性、腐朽性日益加剧。官僚机构庞大，军队日益众多，奴隶主越来越奢侈浪费，于是税收、徭役不断增加，城市流氓无产者有增无已，也不断要求更多的供应。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经济陷

于紊乱状态。凡此种种，都加剧了奴隶制庄园的瓦解，许多奴隶主负债破产，被迫卖掉土地，释放奴隶，自己变成隶农，城市所有制不能维持，城市不断衰落。

随着奴隶制庄园的崩溃，城市经济的破坏，市议员就无法完成他们的义务。但是，奴隶主国家却用各种手段胁迫市议员，如果他们逃避义务，或者凑不足税款，就要坐牢，遭到无情鞭笞。所以，这些议员纷纷逃亡，以至这部分人数急剧下降，后来，只剩下十分之一。城市奴隶主阶层的没落，说明奴隶制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

随着城市的衰落，大地产却在城市外面发展起来。这些大地产的来源各式各样。有的是皇帝赏赐给元老，有的是从城市奴隶主那里用收买、抵债或者干脆掠夺的办法得来的，也有的是投机起家的。大地产规模很大，有的连成一片，有的分散各地。西罗马各省都有，而以高卢、北非尤多。它的经营方式，是把土地划成小块，分给奴隶或隶农耕种，要他们缴一部分收获和服一定劳役。在这种土地上劳动的生产者，虽然其法律地位是各式各样的，有奴隶，有隶农，有战俘，还有其它依附居民，但从经济形态分析，他们都具有一定的独立经济，可以支配一部分剩余产品，也可以积累一定财产，因而比奴隶有较高的生产兴趣。从这点来看，这

种大地产,已经不是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而是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了。恩格斯在谈到当时的生产情况时说:“帝政时期罗马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使牧场的面积大大扩展,使乡村人口减少,另一方面则把地产划分成许多小块租地,租给隶农耕种,也就是建立起了依附的小农——后来的农奴的先驱——的细小农户,确立了一种孕育着中世纪生产方式的萌芽的生产方式。”^①

隶农制这时大大发展起来。隶农来源很多,有些来自原来的佃户,有些就是原来的奴隶。到三世纪时,隶农已在农业中占多数,以前把战俘当奴隶使用的惯例,已改变为把战俘当隶农。隶农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②但是在奴隶主阶级专政还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奴隶主总是力图把隶农当作一种变相的奴隶。晚期罗马帝国的各代皇帝曾经三令五申地一再加重对隶农的压迫,力图把隶农降到和奴隶相似的地位,其中有一条敕令明确规定:“隶农虽然身分上是自由的,但他们仍应该被看作是自己生长的那块土地上的奴隶,不能自由迁移和走动,土地的主人对他们可以使用庇护权和统治权。”这就是罗马最大奴隶主——皇帝对待隶农的

^①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551—552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46页。

态度。这说明了罗马皇帝是垂死的奴隶制反动势力的代表，妄想开倒车。

但是，不管反动派如何企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封建性的大地产还是发展起来了。在奴隶制度无可救药的衰败之中，只有它是生气勃勃的新兴力量。大地产越来越多，它形成一个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在它的内部，逐渐发展了手工业，生产必须的手工业品，甚至建筑材料与输水管也自己解决。因此，大地产已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当时的商品流转范围，摆脱了罗马帝国的监督。这些大地主还拥有自己的武装、监狱和法庭，国家官吏不能随便进入大地产内，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一种独立性，俨然国中之国。大地产为了经营获利，就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三世纪起，大地主在这方面用尽各种手段，购买俘虏和卖身为奴的自由民，收容从奴隶制庄园逃亡的奴隶和隶农，把无力偿付债务的人强制留在自己的领地内，特别是发展了“庇护制”，即引诱许多破产的、负债的、逃避赋税徭役的各种农民、隶农等，到他的大地产内来。许多小农往往把自己的土地也交给大地主，然后再领回来耕种，交纳一定收成，以取得大地主的保护。大地主经济的发展，排挤着奴隶制庄园，促进了奴隶制农庄的瓦解。罗马皇帝曾企图限制大地产，颁布了若干法令，反对“庇护制”，并且明

确规定：大地主每收留一个农民，要罚二十五——四十磅黄金。尽管如此，投奔大地主的自由民越来越多，并且连在皇帝庄园上劳动的隶农和奴隶也大批地逃到大地主的田庄上来。

这就证明新兴封建制比奴隶制有很多的优越性，奴隶制的灭亡与封建制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

(二)

随着经济上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产生，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在罗马帝国内部逐渐成长起来了。这些占有大量土地、役使许多隶农的大地主，散布罗马帝国各行省，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在中央，元老院中有不少他们的代表（据估计当时元老半数以上是外省地主），所以，在三世纪开始的政治斗争中，元老院往往成为新兴地主利益的代表者。

封建地主产生以后，首先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本阶级的要求，和垂死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没落奴隶主的思想代表是生活在二世纪末三世纪初的文学家菲洛斯特拉特，他是谢维路斯（222—235年）的皇后多米娜的宠臣。在他所写的小说里，反映出

奴隶主阶级的政治纲领。他们主张保存作为罗马奴隶制帝国基础的城市制度，主张保持城市内部的一致，城市富人应该拿出一部分钱，为城市做好事，如搞建筑、举办公共娱乐、慈善事业等。也就是说，要保持城市内部奴隶主团结一致，共同镇压起来造反的奴隶。他们打着反对贫富不均、主张公道的旗号，要求限制富人的政治、经济力量，也就是要限制封建地主的成长。他们赞成一个强有力的为奴隶主服务的皇权，以镇压奴隶的反抗和限制大地主，但认为皇位应父死子继，不宜采取收养义子的办法（罗马帝国皇位继承名义上仍由元老院选举，但实则皇帝生前都收养其亲属或部将为义子，以定继承人），以免受制于元老院。新兴封建主的思想，反映在当时历史学家狄奥·卡西约的作品和另外一部叫《历代皇帝传记》的作品中。他们主张取消城市自治、城市权利和有关城市的一切。全帝国应该只有一个城市，那就是罗马，其余的城市应该都化为乡村。他们还主张取消罗马的国有地和皇室土地，转卖到私人手中，降低或免除这些土地的税收。很明显，这就是要扶植封建地主成长，让他们发家致富，好取代奴隶主。在对待皇权的问题上，帝国西部的大地主都要求削弱奴隶制皇权，给各行省以最大经济政治独立，国家派到各行省的官吏职权要受到严格限制，这就是反对

奴隶主政权对新兴封建主的压制。

不难看出，到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罗马新兴地主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针对奴隶主阶级复辟倒退的反动纲领，提出了本阶级的革新要求。但是，当时的封建主还只是奴隶社会内部的一个微弱的反对派，他们虽然意识到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不过政治上还很不成熟，还认识不到要夺取政权。在这样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导下，在所谓“三世纪危机”时期，罗马地主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一方面反映了新兴阶级生气勃勃的主动行动，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有不成熟性，需要在实际阶级斗争中加以提高。

谢维路斯王朝(193—235年)时期，开始了新兴封建主反对奴隶主的政治斗争，当时，他们想拥立一个皇帝，能照顾封建主的利益，执行有利于封建主的政策，这样一种想法实际是行不通的。所以，谢维路斯王朝的历代皇帝，大都是照顾城市利益，而反对元老地主的。经过这样一段实践，新兴地主阶级的认识有所提高，开始采取新的斗争手段，于是爆发了北非的高尔吉亚起义。

罗马帝国时期的北非包括毛里塔尼亚、努米底亚、阿非利加、昔兰尼加诸行省(大体为现在的摩洛哥、阿

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诸国北部一带)。这里大地主势力发达，根基也较为雄厚。皇帝马克西米连(235—238年)在位时，积极执行有利于城市奴隶主的政策，大量没收元老土地，处死他们，引起各地地主广泛不满。

二三八年，由于马克西米连派到非洲的长官，用重税勒索非洲地主，并且要没收他们的财产，迫使一些地主举行了起义。他们武装了自己的隶农、奴隶等，杀死收税吏，拥立非洲最大的地主高尔吉亚(年已八十)为皇帝。高尔吉亚很快得到罗马元老院的承认，但驻扎在非洲的罗马军团反对他，击溃了他匆忙组织起来的部队，高尔吉亚阵亡。接着在意大利和罗马爆发了马克西米连和元老派的内战，混战了好几个月，方才暂时趋于稳定。这次事件无疑是新兴封建主的一次武装斗争，但缺乏明确的目标，组织的也不好，所以很快陷于失败。

新兴封建主的第二次大发动是高卢独立。皇帝伽里耶(253—268年)当政时，以追踪奥古斯都为目标，妄图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声威。他用一切办法保证城市奴隶主和军队的利益，激起各地地主阶级的反对，帝国政权趋于瓦解。二五九年，高卢地主拥立波司图姆为元首，宣布独立，成立高卢“帝国”。波司图姆在高卢设

立了政权机构，有元老院和各级官吏，铸造了货币，建立了武装。他特别重视骑兵，吸取日耳曼人参加他的军队。这个政权得到西班牙、不列颠等地的承认，依靠新兴势力，坚持了十几年。罗马皇帝当时忙于和进入帝国的日耳曼人作战，无暇对付波司图姆。波司图姆死后，他的后继者仍然坚持了一段时间。

高卢“帝国”是在罗马帝国境内新兴封建主建立的自己的政权。以波司图姆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虽然敢于和罗马奴隶主在政治上破裂，但他们还认识不到，不捣毁奴隶主政权，新兴封建主政权是建立不起来的。据说伽里耶曾向波司图姆提议，用个人决斗解决争端。波司图姆回答，他不会允许伽里耶越过阿尔卑斯山，本人也永不和罗马交战。这虽然是一时传闻，但也反映当时地主阶级认识的局限性。

从公元三世纪中期开始，罗马帝国境内人民起义达到新的高潮。先是北非爆发了当地部族摩尔人的起义，高卢也发生了有名的巴高达（凯尔特语意为战士）运动。在塞纳河与罗亚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无数奴隶、隶农、农民组织起战斗队伍，“庄稼人变成步兵，牧人变成骑兵”，攻打奴隶主的巢穴，甚至占领城市。劳动群众主要打击目标当然是腐朽没落的奴隶制，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其锋芒也扫及剥削他们的大地主。

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害怕人民的本性，对奴隶主阶级的妥协性就发展了。恩格斯在评价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市民阶级的代表马丁·路德时指出，当广大农民和平民发动起来，和他们的一切压迫者算账时，路德就被吓坏了，于是他“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①高卢政权的地主阶级也是这样，人民起义吓坏了他们，他们匆匆忙忙和罗马妥协，取消独立。

以高卢帝国独立的取消为标志，罗马新兴地主中的相当一部分向奴隶主妥协投降了。奴隶主政权得以集中兵力，镇压了人民反抗，渡过政治危机，于是出现了戴克里先(284—305年)和君士坦丁(306—337年)当政时期的暂时稳定。

但是，新兴封建主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是不能靠妥协解决的。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执政时，虽然必须照顾一下地主的利益，把剥削所得的一些残羹剩汤分给他们。但更为坚决，更为根本的是维持奴隶主的利益，极力支持城市奴隶主。四世纪以后的皇帝，更不断采取措施，加强城市，如减轻城市负担，归还城市土地等。同时极力反对庇护制，限制大地主势力的发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07页。

展。与此同时，奴隶主政权对人民的剥削镇压越来越厉害了，用严刑峻法控制奴隶，规定主人可以惩罚奴隶以至鞭挞至死。把隶农固定在土地上，想方设法把他们降为奴隶。总之，奴隶制是愈益反动。

为了打击垂死挣扎的奴隶制，从四世纪起，罗马劳动人民掀起更为广泛激烈的斗争。北非发生了多那图斯教派(基督教中的一派)运动和阿哥尼斯特(希腊语，意为战斗)运动，广大奴隶、隶农发动起义，摧毁庄园，焚烧奴隶债券，销毁奴隶名单，组织部队和罗马反动军展开血战，给他们以很大打击。

四世纪后半期，罗马地主阶级有了新的觉醒。这一方面是劳动人民反奴隶制的斗争给他们以影响和推动，另一方面，向奴隶主妥协投降并未带来什么好处也给他们以教训。他们有一些人参加了多那图斯教派的反罗马斗争，四世纪末罗马皇帝谴责这一教派的诏令中多次提到其中有些元老并大地主甚至行政长官。地主参加多那图斯教派，是想利用这一反罗马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给本阶级捞取好处。但这样一个变化有着重要意义，说明罗马地主阶级由惧怕人民，妥协投降，走向争取和利用人民力量，和罗马反动政权展开斗争。这标志着斗争的新水平。

反动阶级决不会自动交出政权，罗马奴隶主政权

虽然不断受到打击，陷于土崩瓦解之中，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还要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最后的挣扎。从君士坦丁起，把首都迁到拜占庭（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依靠东部行省的有利政治、经济条件，妄图巩固奴隶主统治。狄奥多西（379—395年）之后，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二部，各有皇帝与副皇帝统治，想用分而治之的办法，苟延残喘。所以，罗马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还需要一个新的发展过程才能完成。

（三）

从公元四世纪末期起，日耳曼人大批进入罗马帝国，推翻罗马奴隶制的斗争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日耳曼人原居罗马帝国北部沿莱茵、多瑙河一线广大地区，分为许多部落，很早就和罗马有往来。纪元一世纪末，他们已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以经营农业为主，畜牧业也相当重要。土地还没有成为私有财产，但已有贫富不均，出现了奴隶。组织形式有人民大会、长老议事会、军事领袖等，还没有形成国家，正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到四世纪时，日耳曼人的社会进一步发展，军事领袖的权力有所增长，他们通过战争或其他手段积累了更多的财富，跟随他们的亲兵人数更多了，有

的甚至还有雇佣兵。人民大会的作用日见缩小，军事领袖一职逐渐由某些显贵家族所垄断，出现了转化为世袭王权的征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正处于原始社会瓦解、国家产生的过程中。

日耳曼人大批进入罗马后，日耳曼贵族成为取代罗马奴隶主、建立新兴封建国家的新的统治阶级。但日耳曼贵族一开始还并不是封建主，而是氏族贵族，进入帝国之后，他们加速转化为封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族迁徙、连续战争割断了氏族纽带，加剧了内部分化；更重要的是受到罗马地区经济条件的影响，直接开始了向封建制的转变。^①如日耳曼人中的一支汪达尔人，三世纪时居奥得河中游，已然出现贫富分化。三世纪中期向西迁徙，到四〇九年，他们突入西班牙时，已然形成王位世袭制。占领西班牙后，汪达尔人瓜分了罗马奴隶主的土地和财产，一些汪达尔贵族占据了大块土地，剥削在这块土地上耕作的隶农和奴隶，很快就转化成为封建主。另一支日耳曼人西哥特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四世纪七十年代他们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麦西亚（今保加利亚北部一带）地区时，曾经占

^① 日耳曼人所以能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主要因为他们在人口上居于少数，进入罗马帝国后和当地人民很快融合，接受了当地先进的生产力和已经存在的封建生产关系，因而越过了奴隶制。

据土地进行耕作。罗马的条件无疑给他们以影响，西哥特贵族从此加速封建化，因此，他们的领袖阿拉里克在三九五年开始称王，军事民主制进一步衰落。四一八年，他们进入南部高卢和西班牙比利牛斯山一带，夺取罗马奴隶主三分之二土地进行分配，建立了封建国家，封建制度迅速成长。

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后，在反对罗马奴隶主的斗争中，罗马新兴地主逐渐和日耳曼贵族结合起来。北非的情况最为明显。早在四二九年汪达尔人进入北非之前，当地大地主保尼法斯已经据地独立，和罗马对抗。由于受到罗马政府的威胁，保尼法斯遂和当时在西班牙的汪达尔领袖真塞立克联系，结为盟友，请他到非洲来共同反对奴隶主反动派。于是真塞立克率领汪达尔人渡海进入北非。^①在西欧大陆上其他各处，也不同程度地或迟或早地产生了这种联合。在各日耳曼新兴封建国家中都发现存在着罗马地主的许多大地产，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可以说，日耳曼贵族能够取代罗马奴隶主，建立新兴封建国家，是在罗马劳动群众对奴隶制反复冲击的基础上、在罗马地主阶级长期斗争的基础上完成的。苏修史学界散布“单靠罗马社会内部力量

^① 普洛哥比(罗布古典丛书，一九三五年伦敦版)，Ⅱ，Ⅱ，25—26。

不能进行革命变革”的谬论，是对人民创造历史、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等马列主义原理的极大歪曲，是为新沙皇的侵略扩张服务的。

和罗马地主比较起来，日耳曼贵族有他们的优越性。这首先是日耳曼人内部阶级对立还未充分发展，贵族还未具有那么严重的对人民群众的敌视和恐惧。在战时，日耳曼人的领袖率领全体成年男子参加战斗，这支军队也较易和起义的罗马奴隶、隶农相结合。这样，日耳曼贵族就能争取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组成巨大的战斗部队，和罗马奴隶主决战，终于消灭了他们。其次，日耳曼贵族受罗马奴隶主思想影响很少，斗争比较坚决，妥协性少，能把武装斗争坚持到底。正是这两点克服了罗马地主阶级路线上的重大缺陷，使推翻奴隶制的斗争取得成功。

下面我们主要从西哥特人的斗争加以具体论述：

四世纪七十年代，居住在黑海北岸的西哥特人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麦西亚等地居住。罗马奴隶主压迫西哥特人，不供给他们粮食，掠卖他们为奴隶。西哥特人在自己的领袖弗里提格伦领导下起义，手执武器反对罗马奴隶主。当地被压迫群众纷纷前来参加起义，“新来的参加者包括以前被商人出卖的本族人，还有当他们最初来到此地时，因为饿得要死，被用

来换了一杯坏酒或几片面包的人们。此外还有许多金矿工人和许多不能忍受重税的人们。”^①三七八年，弗里提格伦率领起义队伍，在亚德里亚堡附近大败罗马军，歼灭罗马军队四万多人，杀死东罗马皇帝瓦伦斯（364—378年）。三九五年，定居在麦西亚一带的西哥特人再次发动起义，并推选阿拉力克为自己的国王。阿拉力克率军转战色雷斯、马其顿（今希腊北部一带）、希腊等地，并曾进迫君士坦丁堡城下。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各地的奴隶、隶农也纷纷起义，给东罗马帝国以很大打击。使它自顾不暇，无力援助西方的罗马奴隶主。

四〇一年，阿拉力克决定进军意大利，直捣西罗马奴隶主的巢穴。他率领队伍从伊利里亚（亚得里亚海东岸）出发，越过阿尔卑斯山，首先围攻米兰（西罗马皇帝和诺留〈393—423年〉驻米兰），一路上得到被压迫群众的支持，许多奴隶投奔他的队伍。米兰没有攻克，阿拉力克率军南下。当时队伍中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些人仍然害怕罗马帝国这个“庞然大物”，不敢向它进攻，主张及早退出意大利。阿拉力克坚决驳斥了这种谬论，公开申明自己的使命就是要攻下罗马城，号召战

^① 阿米安·马尔策林（罗布古典丛书，一九三九年伦敦版），XXXI, 6, 5—6。

士继续前进。虽然这一次没有能攻下罗马，但说明了阿拉力克斗争的坚决性。

四〇八年，阿拉力克再次攻入意大利，进击罗马。在进军途中，又跑来一个奴隶主的走狗——基督教僧侣向他游说，要他放弃进攻罗马城。阿拉力克不信这一套鬼话，继续进军，包围了罗马城。附近奴隶纷纷参加他的队伍，总计有四万多人，另外不少罗马士兵（多为受雇的日耳曼人）也转到阿拉力克方面来。阿拉力克军队的声势越来越大，而西罗马政府则奄奄一息。皇帝和诺留早已躲在拉文那，不敢援助罗马城。东罗马还派了六千军队前来救援，但半路上都被阿拉力克消灭了。

这时，残存的罗马元老院出面和阿拉力克议和。阿拉力克本来坚持革命到底的正确路线，但这时在胜利的形势下一时动摇，答应讲和。于是选出罗马人阿特鲁斯为皇帝，阿拉力克为将军，组成新政府，然后进攻拉文那。和诺留惊惶失措，无法抵抗，向阿特鲁斯提议和平，答应愿平分西罗马。

阿拉力克等组成的新政权基本上是个妥协的产物，势必不能持久，在如何对待北非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北非当时是罗马的粮食基地，仍在罗马奴隶主手中，如不能确保北非，则罗马城也无法守住。阿拉力克

主张率军进攻，拿下北非；阿特鲁斯主张派人游说，诱其投降。后来派去游说的人都被罗马奴隶主杀了，罗马城由于粮食缺乏，发生饥荒，但阿特鲁斯仍然反对向北非进兵。

阿拉力克这时觉醒了。他看出阿特鲁斯仍是罗马奴隶主的代表，不能与之合作。而这时阿特鲁斯却同和诺留加紧了勾结，最后竟然自己退位，投降和诺留。和诺留则秘密派出军队，袭击阿拉力克。

事实教育了阿拉力克，对反动奴隶主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武力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他指挥军队再围罗马，全力进攻。城内奴隶积极响应，为阿拉力克打开了城门。四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这个西罗马帝国奴隶主的反动巢穴，所谓“永恒之城”的罗马，终被攻克了。阿拉力克对奴隶主进行了镇压，他们许多人被俘、被杀或被卖为奴，财产被没收。残存的奴隶主则逃往东方、逃到君士坦丁堡去。

随着四一〇年罗马城的攻克，西罗马帝国事实上已灭亡。此后日耳曼诸国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纷纷建立起来，开始了封建主义的新时代。在这场斗争中，以阿拉力克为代表的新兴封建主，在人民的支持下，能够坚持正确路线，总结经验，继续奋斗，终于取得胜利，反映了新兴阶级生气勃勃的战斗精神。

封建社会初期地中海地区 一场复辟反复辟斗争

(一)

六世纪初,古代文明集中地之一的地中海周围,正值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大转变时期。国际、国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纵横交织,呈现出异常纷繁复杂的情景。

以地中海为内湖的统一的罗马奴隶制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和东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东哥特(在意大利)、西哥特(在西班牙)、汪达尔(在北非)、法兰克(在高卢)等新兴封建国家相继建立起来。这里奴隶制的桎梏已被革命暴力摧毁,劳动人民地位有所改善,封建制不断向前发展。虽然由于奴隶制垂死时带来的严重破坏,生产一时还不够发达,但总的趋势是进步的、向上的。在东方,东罗马帝国还保存着奴隶制,广大人民仍然遭受残酷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反动的奴隶制政权财政困难,兵力疲蔽,

狼狈不堪。虽然表面上帝国还维持着虚假的繁荣，首都拜占廷等城市依然贸易发达，商贾云集，但掩盖不住根本的衰微没落景象。

两种制度、两个世界，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

在西方的新兴封建国家中，日耳曼封建主建立政权之后，都采取了一定措施，发展封建经济，巩固封建制度。如剥夺罗马奴隶主的部分土地分赐臣下，逐步加强国家机器、制定封建法律等等。但是，旧制度不是轻易地就会死去的，这些国家里奴隶制的残余依然严重存在，奴隶主复辟势力到处潜伏着，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和新政权较量。而这些国家旁边的东罗马奴隶制帝国，更是虎视眈眈，无时不想消灭它们，以实现其侵略扩张、恢复旧罗马帝国的反动迷梦。因此，东哥特等国家中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就和当时国际上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对外表现为反侵略反干涉的斗争，国内表现为亲罗马还是反罗马的斗争，而国内的斗争必然要引起国际斗争。

如北非的汪达尔王国，国王迦塞立克（428—477年）于四三九年占领迦太基为首都，建立封建政权。迦塞立克对奴隶制复辟有较高的警惕，执行了比较正确的路线。他没收了奴隶主的全部土地财产，镇压了一批罗马奴隶主，赶走了反动的基督教主教，对东罗马一

直持强硬态度，从不承认是它的藩属。他的舰队出没在希腊、小亚细亚各港口，威胁君士坦丁堡，给东罗马政权以很大打击。迦塞立克死后，起初他的几个继承人大体还执行了他的路线，继续反复辟的斗争。国王贡特芒德(484—496年)时，一个反动文人作诗称颂东罗马皇帝，惑乱人心，被捕下狱治罪。

奴隶主复辟的手段是很狡猾的。当他们发现公开很难活动时，就用糖衣炮弹向汪达尔封建主展开进攻，用罗马文化、罗马生活方式腐蚀他们。一部分汪达尔封建主，抛弃了过去朴素的生活，逐渐“罗马化”，住罗马奴隶主的豪华别墅，过罗马奴隶主的奢侈生活，思想上当然也就认为罗马奴隶制好、东罗马奴隶主可亲了。这些人在汪达尔政权内部形成一股势力，国王特拉萨芒德(496—523年)时已经受到影响，停止了对正教(基督教中以君士坦丁堡主教为首的一派)的限制，企图和东罗马修好。到希尔得里克(523—531年)时，就执行了向东罗马妥协投降的路线。

希尔得里克从小受罗马奴隶主文化影响很深，上台后任用罗马派，一方面和东哥特决裂，一方面和东罗马和好，甚至不惜屈伏称臣。在国内对正教宽容，容忍复辟势力活动。于是复辟分子愈来愈猖狂，甚至公开准备武装叛乱。希尔得里克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人

民群众和地主阶级内部反罗马派强烈不满。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反罗马派展开斗争，废黜了希尔得里克，由黑利默（531—534年）当了国王。东罗马利用这个事件，开始了对汪达尔的侵略战争。

东哥特的情况也有一些和汪达尔相似之处。东哥特第一个国王狄奥多里克（493—526年），从小在东罗马宫廷中当人质，受罗马奴隶主教育。四八八年他率兵到意大利，名义上是得到皇帝的允许，为帝国平定奥多亚克的叛乱的。建国以后，他执行了一条妥协路线，对罗马皇帝称臣，自称其国家一切都模仿东罗马。他铸造的货币用的是罗马年号，宫廷官职设置一如东罗马，地方行政也多维持罗马旧制，只是军队、重要官吏是东哥特人。宗教上虽然信仰阿利安派（基督教中的一派），但对正教也很宽容。

狄奥多里克的这些政策，发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激起了坚持革命的东哥特封建主的反对，另一方面使奴隶主复辟势力大为高兴，他们乘机串联，策划复辟，叛乱随时可能发生。狄奥多里克晚年，感到形势严重，在反罗马派支持下，不得不试图改变做法，对复辟势力进行一些打击。五二三年，发生了罗马元老和君士坦丁堡秘密通信、企图叛乱的事。后来派往拜占廷办理宗教事务的罗马教皇也和皇帝勾勾搭搭，图谋

不轨。狄奥多里克镇压了这些复辟派，有的逮捕监禁，有的处死。但狄奥多里克不久死去，临死仍然遗嘱要和东罗马修好，并没有觉悟过来。

狄奥多里克死后，由他年幼的外孙阿特拉里克（526—534年）继位，实际上执政的是他的母亲、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拉马孙塔。

阿拉马孙塔依靠亲罗马派，继续执行妥协路线。她发还了被处死的罗马元老财产，宣布保护正教，对东罗马极力和好，对年幼的儿子阿特拉里克也按照罗马奴隶主那一套加以教育。这些措施激起反罗马派很大不满，一次他们抓住阿特拉里克因为学习不好、受责备后哭哭啼啼这件事，往见阿拉马孙塔，和她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他们说，应该放弃罗马奴隶主的那一套教育办法，按照哥特人的办法教他作战，如果一个青年人动不动就哭哭啼啼，那他以后如何还敢面对刀剑呢？阿拉马孙塔没法反对，只好答应改变教育办法。

教育方针的斗争是一个信号，表明东哥特封建主内部反罗马派力量日见壮大，对阿拉马孙塔形成威胁。但是，她想的不是如何改过自新，和革命派走到一起，而是变本加厉，向东罗马妥协投降，甚至秘密谈判，不惜把整个国家奉送东罗马，自己去君士坦丁堡“避难”。

五三四年，阿特拉里克病死，为了巩固统治，阿拉

马孙塔改嫁给表兄弟狄奥达特，让他当了国王。狄奥达特实际上是个罗马派，但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上台后立即和反罗马派结盟，利用他们的力量，逮捕并杀死了阿拉马孙塔，自己独揽大权。这个事件，又给东罗马帝国利用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东哥特的战争。

(二)

六世纪的东罗马，表面上是一个大国。它占领着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广大的奴隶、隶农等劳动人民在这里受着残酷剥削。它又是一个民族牢狱，希腊人、小亚细亚人、阿尔明尼亚人、叙利亚人、科普特人(古埃及居民)、色雷斯人、伊利亚人等众多民族受着一小撮东罗马奴隶主的压迫。

皇帝是帝国最大的奴隶主头子，下面有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军政首脑、达官显贵，都是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这些人有许多是随皇帝君士坦丁从罗马搬来的奴隶主后代，还有不少是西罗马灭亡后逃来的奴隶主。他们无时不在梦想向西方反攻倒算，以恢复其失去的天堂。

基督教正教会是奴隶制的辩护士，它的教阶结构和帝国官僚系统一样庞大复杂。各地主教、教士、僧侣

构成剥削和控制人民的网。它用消灭异端、教会统一的说教来为帝国的侵略辩护，而不少从西方逃来的教士更是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帝国还保留不少工商业城市，有一批工商业奴隶主。他们对失去西方的市场深为不满，积极支持向西方侵略。

在这样一些奴隶主阶级势力的支持下，查士丁尼（527—565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查士丁尼是前任皇帝查士丁的外甥，从小生长宫廷，受奴隶主阶级教育，满脑子反动思想。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复辟狂，日日夜夜都祈祷上帝，希望上帝保佑他恢复过去的罗马大帝国。他更是一个疯狂侵略扩张的野心家，梦想东方占领两河流域，西方直到直布罗陀，向南控制红海海口，向北霸占黑海北岸，建立一个比罗马奴隶制帝国还大的大帝国。在他当政的差不多半个世纪中，进行了多次的侵略战争，造成很大的破坏。他还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学得一整套反革命政治伎俩。表面上温文尔雅、宽仁忠厚，实际上阴险狠毒、狡诈虚伪。为了实现他的反革命计划，查士丁尼进行了疯狂的努力，亲自处理内政、外交、军事、文化、教会各项事务，常常彻夜不眠，在宫廷中筹划各种阴谋。

查士丁尼贯彻执行了一条侵略扩张、复辟倒退的反动路线，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统一国家、统一教会、统一法律。他的一切内外政策，都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所谓统一国家，就是反攻倒算，恢复罗马帝国。为此必须加紧在国内剥削镇压，为向西方侵略造成一个巩固的后方，提供充足的财源。他上台后搞了很多“改革”，法令多如牛毛，特务横行遍地。表面上严禁贪污受贿、侵逼贫民，实际上税收惨重、民不聊生。例如当时实行一种贸易垄断税，即以向国家交一笔钱为条件，国家赐给各商业公会以定价权。投机商于是任意抬高物价，日用品上涨三倍，城市贫苦人民大受其苦。又如为保证粮食供应，在各省强迫征购粮食，定价很低，又不管当地丰歉。许多缺粮农户被迫以高价从外省买粮，回本省交纳。农民大受其苦，农村残破。

所谓统一教会，就是要弥合基督教内部分歧，使君士坦丁堡主教与罗马教皇和好，利用罗马教皇作为复辟的桥头堡。而对人民中流行的异端，西方新兴封建国家信奉的阿利安派，则大肆迫害，在统一教会的幌子下向西方侵略。为此，他坚决干预教会事务，主张皇帝不仅是国家元首，也是教会领袖。一切教条、仪式，最后都由他裁决。五二七——五二八年颁布法令，不许

信仰其他教派。异端不得有自己的教会组织，不许举行仪式，拆毁异端教堂，剥夺信仰异端的人的政治权利。并派出军队，四出逮捕杀戮，特别在小亚细亚等地杀死很多信仰异端者。

所谓统一法律，就是用过时的、反动的罗马法来巩固奴隶制，反对新兴的封建制，加强对革命的镇压。他一上台就派人编定罗马法，把自古以来的罗马奴隶主的法律、诏令、法学著作，根据巩固奴隶制的需要，进行删定，成为《国法大全》一书。立法一方面强调君权神授，皇帝具有无限权力，他本身就是“活的法律”，可以对臣民实行任意统治；另一方面对人民反抗则加紧镇压。如规定奴隶或下等人放火或武力暴动者要焚死或钉死在十字架上，抢劫富人住宅要处死，奴隶意图杀害主人或者听见主人呼救不去救助也要焚死。关于所谓叛国罪的处罚也很严酷，罪行包括手执武器反对皇帝、打死官吏、图谋夺取政权、暗通敌人、在战时帮助敌人等等。犯这种叛国罪者人人都可告发，犯法者处死并没收财产，还要罪及子孙，甚至规定凌辱皇帝肖像的人也要处死。这些规定说明奴隶主的疯狂，但也反映他们在革命浪潮冲击下心惊胆战，坐卧不安。

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条反动路线，查士丁尼在加强国内反动统治的同时，利用前几任皇帝榨取来的经济

力量，在奴隶主、教会、商人等的支持下，积极开始向西方侵略。他的矛头首先指向北非的汪达尔王国。

查士丁尼以汪达尔国王希尔得里克被废为借口，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威逼黑利默退位，还要黑利默把希尔得里克送往君士坦丁堡，“否则不会善罢甘休”，^①并扬言要撕毁四七六年订立的和约（指迦塞立克与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订立的永久和约）。

其实，查士丁尼当时地位很虚弱。他在东方和另一个大国波斯已进行了很久的战争，手中没有可以调动的军队。五三二年君士坦丁堡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平民起义（号称“尼卡”起义），查士丁尼一度吓得想乘船逃命，后来用金钱收买起义队伍中的上层分子，制造了分裂，才用武力镇压了起义。所以，在是否侵略北非的问题上，奴隶主内部也有意见分歧。一部分奴隶主（包括查士丁尼信任的专管财政的大臣约翰在内）反对进军，认为劳师远征，经费不足，给养困难；汪达尔人骁勇善战，可能要打败仗；而意大利又在东哥特人手中，打下北非也守不住。但查士丁尼不顾一切，不惜以赔款一万一千磅黄金为代价，向波斯乞得和平，东兵西调，发动对北非的侵略战争。

^① 普洛哥比，Ⅱ，Ⅴ，18—20。

五三三年，查士丁尼拼凑了一万六千兵士，由贝利撒留率领，乘船向北非进军。复辟势力的活动总是内外相勾结的，这时汪达尔国家内部的复辟派也出来大肆活动。先是黎波里（今利比亚北部沿海一带）地方发生了奴隶主叛乱，策动接应东罗马军队；接着又在撒丁岛上发生了野心家高达时的“独立”，他向东罗马表示投降，呼吁派兵来援。黑利默没有立即镇压近处的黎波里的小股叛乱，给侵略军留下可以利用的接应登陆点，但却派兵五千人前往撒丁，犯了不适当地分兵的错误。

五三三年九月，侵略军在北非登陆。黑利默率军抗战，并积极争取援军。但援军来的不多，东哥特不仅不支援同是新兴封建国家汪达尔，反而把西西里岛供拜占廷使用，使侵略军有了一个中转站。黑利默兵力单薄，指挥不当，打了几个败仗，都城迦太基失守，不得已退往努米底亚（今阿尔及利亚东北一带）山区，最后投降，五三四年汪达尔国家灭亡。

当查士丁尼和汪达尔作战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拉拢东哥特。但当他在北非得手之后，立即翻脸不认人，借口为被杀的阿拉马孙塔报仇，挑起侵略意大利的战争。这时他兵力仍然不足，五三五年春分东西两路夹击东哥特，主攻的西路军由贝利撒留率领，也只有八千

人。另外，他还利诱北面的法兰克王国，约定出兵进攻。新兴封建国家没有联合起来，反被分化利用，再次上当受骗，给侵略者造成机会。

战争开始，侵略军两面都取得胜利。东路占领达尔马提亚(今亚得里亚海东岸)，西路占领了西西里，狄奥达特被吓破了胆，不是组织抵抗，反而一再求和，甚至提出奉送整个意大利给侵略者。狄奥达特的可耻行径激怒了广大哥特战士和反罗马派封建主，他们废黜了他(536年底)，选举维提海斯为国王，领导抗战。

东哥特军队数次击败侵略军，把贝利撒留围困在罗马城达一年之久。贝利撒留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狼狽不堪。但维提海斯已在政治上表现出妥协性。他因为出身平民，为了提高身价，便和阿拉马孙塔的女儿结了婚。这个女人完全继承了她母亲那一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亲罗马派。她不断进行阴谋活动，为拜占廷作内奸。

五三八年春天，罗马城久围不下，哥特军队也十分疲劳，不得已撤军。东罗马增派援军，法兰克也从北面骚扰，东哥特军渐失利。五三九年末，贝利撒留率军围攻东哥特首都拉文那，城内发生了亲罗马派策划的叛乱，维提海斯投降，东哥特绝大部分地区都被侵略军占领。

汪达尔、东哥特等新兴封建国家被没落的奴隶制国家打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主观方面分析，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封建主对如何巩固政权，经验还很不够，不能贯彻执行一条正确路线；许多封建主思想上受“罗马化”腐蚀，作了奴隶主的俘虏，蜕化成为亲罗马派、复辟派，有的封建主在尖锐的武装斗争中屈服成为投降派；而新兴封建国家之间，又不能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反而互相拆台。这样，内外敌人相互勾结，颠覆了新政权。从客观上看，奴隶制虽然已是气息奄奄、垂死挣扎，但东罗马奴隶制国家经济上还有相当实力（东罗马小农经济发达，工商业兴盛，奴隶制经济危机没有西罗马那样厉害），在政治斗争手段和军事技能上，东罗马奴隶主也有长期积累的经验，这些都比西方新兴封建国家优越，因而也促使新兴封建国家汪达尔、东哥特等在这次战争中失败。

五五三年，查士丁尼又派兵进攻西哥特王国，占领了西班牙东南部地区。

查士丁尼大搞侵略扩张，经过二十多年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先后占领了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东南部等地，罗马帝国昔日的规模好似又得到恢复，地中海又成为罗马的“内湖”，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查士丁尼，这时似乎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了。其实好景

不长，这只不过是奴隶制的回光返照而已，反动派的垂死挣扎，挽救不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

(三)

查士丁尼的侵略扩张，给广大北非、西欧人民带来了双重灾难。一方面，多年的侵略战争造成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随着侵略军而来的旧制度的复辟，使广大人民重新陷入奴隶制的深渊。

罗马侵略军攻入北非、意大利后，到处烧杀劫掠，罪行擢发难数。在意大利，“罗马的将军和士兵都抢劫居民的财产，他们横行霸道，不受任何约束。将军们躲在堡垒里和妇女酗酒作乐，士兵们越来越不服从命令，不守任何纪律。”^①意大利人民的土地和财产被掠夺，受到残酷拷打直到无辜被处死。而且，东罗马帝国的侵略军攻占意大利和北非后，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复辟已经灭亡了的奴隶制度。他们恢复了旧日罗马帝国的行政机构，开动了吃人的奴隶制国家机器。强制人民信奉正教，残酷地镇压反对正教的“异端”。恢复奴隶主阶级私有权，所有被剥夺的他们的土地要归还原主，

^① 普洛哥比：Ⅵ，Ⅹ，1—6。

逃跑的、获得自由的奴隶和隶农也要追回。罗马的税制又都恢复，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千百万人倾家荡产。旧制度复辟带来的巨大灾难是：历史倒退，人民遭殃！

在这严重的历史关头，劳动人民奋起反复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下辉煌壮丽的历史篇章。在人民的推动下，一些新兴封建主也起来反对复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表现了新兴阶级的革命气概。

在北非，当汪达尔王国政府军失败之后，“**人民，这个最后的、最高的审判官，又重新出现在舞台上**”，^①挑起了反复辟的历史重担。五三四年，当贝利撒留刚一撤离北非，努米底亚等处就爆发了当地毛里塔尼亚部落起义，起义延续了好几年，给罗马侵略军以很大打击。五三六年，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罗马士兵和北非人民起义。原来罗马士兵很多都是雇来的日耳曼人，汪达尔战争结束后他们要求分得土地，东罗马政府却把土地归还给原来的奴隶主，不给他们分配。这些士兵多是阿利安派，在军中受到歧视，并时常被克扣薪饷；罗马政府对当地居民、特别是对汪达尔人的迫害，也使他们深感不满。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遂导致起义

^① 恩格斯：《反革命的进攻和革命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577页。

的爆发。

起义军杀死人们痛恨的罗马军官，占领宫殿，袭击奴隶主，推选出土兵斯多滋为领袖。参加起义的有罗马士兵、原汪达尔战士以及奴隶。他们很快组成装备优良的军队，控制了首府迦太基。罗马北非统帅所罗门吓得赶快坐船逃命，到西西里向正在和东哥特作战的贝利撒留求援。贝利撒留虽然来了一段时间，但并无多少兵力，无济于事，最后只好退走。

斯多滋指挥起义军，转战努米底亚各地，连战皆捷。三分之二的罗马士兵都参加了他的队伍。起义军和当地毛里塔尼亚人联合，把罗马奴隶主打得大败。查士丁尼坐卧不安，派自己的侄子赫尔曼前去镇压。赫尔曼虽曾暂时打败斯多滋，但不久又爆发了新的起义。后来所罗门清洗罗马军队中的汪达尔人，到处筑垒固守，方才暂时维持住局面。

五四四年，毛里塔尼亚起义人民打死所罗门。次年，斯多滋又从西边出击，直趋比萨琴那（今突尼斯南部），击溃罗马军，俘虏罗马指挥官，占领全境。后来斯多滋不幸在作战中阵亡，但人民起义的浪潮仍连续不断，直到五四八年大规模的战斗才渐消逝。

北非人民十五年的反侵略反复辟的武装斗争，使查士丁尼在经济上受到极大消耗，军事上遭到沉重打

击和削弱，牵制了他的兵力，支援了东哥特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更重要的是，人民革命战争使查士丁尼无法在北非完全恢复旧的罗马奴隶制度，无法巩固它的反动的统治秩序。

意大利人民的反复辟斗争开始于五四一年秋天。就在维提海斯投降后没几个月，查士丁尼正趾高气扬地欢庆胜利的时候，波河以北的东哥特人民揭竿而起，推选了年青的军官托提拉为国王，和侵略军展开决死战斗。托提拉是新兴封建主的优秀代表，他不仅作战勇敢，指挥英明，而且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他认识到必须争取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进行反侵略反复辟的战争，因而提出了一条正确路线，执行了一些进步的政策。他没收罗马奴隶主的土地、牲口及其他财产，分给自己的部下和普通士兵。没收了许多教产，严惩投敌教士。对于起义人民夺取的奴隶主土地，也都承认合法。他解放大批的奴隶和隶农，改善奴隶地位，允许奴隶可以和自由人通婚。吸收奴隶、隶农等参加自己的部队，壮大革命力量。他还取消了罗马的许多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也向地主收税。依靠了这些措施，托提拉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取得反侵略反复辟战争的一系列重大胜利。

当托提拉初次起兵时，只有五千兵力，但力量很快

壮大。他由北方向南扫荡，势如摧枯拉朽，罗马军节节败退。五四三年，攻占了那不勒斯城，然后封锁最南端的日德龙港，切断了侵略军的海上供应。他的部队所到之处，都有人民起义响应。

查士丁尼被托提拉起义吓得目瞪口呆，不得已又派贝利撒留前来镇压。但连年侵略，他的实力已消耗殆尽，既无兵力，又缺经费。贝利撒留这个“常胜将军”在人民群众反抗的怒潮面前，再也神气不起来了。他踌躇不前，一筹莫展。而托提拉的部队却在胜利进军，五四五年进围罗马，五四六年末，在城内士兵的接应下，攻下罗马城，惩办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奴隶主，对于饥饿的平民则给予救济。贝利撒留既无力援助罗马，又不敢和托提拉作战，只得写信向查士丁尼求援，信中说：“没有人，没有马，没有武器，也没有钱，……在意大利的兵力不足，连吃败仗，士气低落，十分害怕……大批兵士已经逃到敌人那里。”^①他要求给他派援军来，送粮草来。但查士丁尼也给他送不来多少援助。五四八年，贝利撒留狼狈撤离意大利，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五五〇年，托提拉再次攻下罗马城，并下令修复城市，罗马又有了一些生气。托提拉为了从海上给敌人

^① 普洛哥比，Ⅶ，Ⅹ，3—10。

以打击，建立了强大的海军，进攻达尔马提亚和其他地方，并占领西西里、撒丁、科西嘉等地，东罗马侵略者在意大利只剩下拉文那等四、五个城市，已经濒于失败。

查士丁尼困兽犹斗，继续搜罗力量，派来援军。而托提拉方面却出现了分裂。一些亲罗马派封建主害怕人民革命的日益高涨，不满托提拉的进步政策，逐渐脱离了他。五五二年，在亚平宁山麓的一次战斗中，托提拉负伤牺牲，他的部队被击溃，六千余兵士战死，这对反侵略阵营是一个重大损失。他的部下继续战斗，最后终因力量对比悬殊，退出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灭亡，五五三年意大利重被东罗马占领。

查士丁尼表面上取得了胜利，汪达尔、东哥特的反抗斗争先后都被他镇压下去了。但是，反动派得势终究是暂时现象。他的倒行逆施，只不过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陷入更大的危机。

广大被征服地区，由于侵略战争和奴隶制复辟，社会生产的发展遭到破坏和阻碍。城市毁灭，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人民遭受日益惨重的盘剥，挣扎在饥饿和死亡之中，整个社会充满了尖锐的阶级对立。

在东罗马帝国内部，对外征服使国库资金消耗殆尽，残酷的压榨使农民破产，土地无人耕种，整个帝国经济萧条。反动的奴隶制使社会黑暗到了极点，阶级

矛盾日益激化，居民接二连三举行暴动，外族也不断进攻。东罗马帝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从五五五年起，一切侵略战争都被迫停止了。到五六五年，查士丁尼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反革命终于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了，留给他的继承人一付破烂摊子。查士丁二世(565—578年)不得不公开承认：“国库负债很多，已经枯竭。军队由于缺少供应已经瓦解。因之国家被野蛮人多年蹂躏掠夺，陷于破产。”^①

五六八年，伦巴人进入北部意大利，大规模镇压了罗马奴隶主贵族，推翻了奴隶制统治，赶走了东罗马帝国军队，重建封建制度。六世纪七十年代，东罗马帝国在西班牙的占领地，也被西哥特人民夺回。到七世纪初，东罗马反动奴隶主政权终被人民起义所推翻。查士丁尼侵略扩张、称霸地中海，恢复奴隶制罗马帝国的反动迷梦终于彻底破产。这场反侵略反复辟斗争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终于获得了胜利。

^① 转引自琼斯：《晚期罗马帝国史》（一九六四年伦敦版）第一卷，第301页。

日本大化革新与中国法家思想

大化革新是日本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①这次变革是在当时先进的中国法家思想直接影响下进行的。但是过去的历史学家却把大化革新说成是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研究大化革新的历史，正确阐述中国法家思想在日本古代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我们研究日本古代史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

日本从三世纪进入奴隶社会，六世纪时，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从中国不断输入，铁器更加普遍地用于农业生产，耕地面积日益扩大，水利工程大量兴建，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① 大化，年号，六四五——六四九年。大化革新，指大化年间日本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和改革。

奴隶制度的建立虽然把社会生产力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奴隶制生产关系给予生产力发展的余地毕竟是很有限的。到六世纪中叶，这种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引起了奴隶社会的危机。

日本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特点是部民制。^①生产资料为皇室等奴隶主阶级所占有，作为社会基本生产者的部民，一部分虽然有微少的财产和自己的家庭，但他们并没有人身自由，奴隶主不仅可以无限制地榨取他们的劳动产品，并且可以随意把他们赠送、贡纳。部民，实质上就是日本奴隶的一种。

在部民制下，各级奴隶主对部民实行极端野蛮的剥削和奴役，部民过着非人的贫苦生活，挣扎于死亡线上。《日本书记》^②经常有这样的记载：“五谷不登，百

① 部民，是日本奴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奴隶主剥削的主要对象。部民的来源：一种是某些氏族被强大部落征服后，以血缘关系组成的公社不易打破，征服者不能把他们作为个别奴隶加以奴役，因而保留了这些氏族原来的组织，称为“部”，部内的人称为部民。征服者对他们进行集体的奴役和剥削。这是部民中人数最多的一种。其次是归化人，他们是中国和朝鲜的移民，逃避阶级压迫和战乱而流入日本，被统治者强制编成部，成为部民。归化人一般被编为手工业生产的部。还有少数人因触犯了统治阶级，而被罚为部民。大量部民的存在是日本奴隶社会的一个特点。

② 《日本书记》，八世纪初用汉文写的编年体史书。本文所引材料，除注明出处者外，皆见此书。

姓大饥”、“老者啖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与母子共死”，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悲惨情景。这就是当时日本部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奴隶主阶级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他们“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各率己民，随事而作”，强行征集部民修造屯仓、田庄^①、宫殿、寺院和坟墓。在对外侵略战争中，部民还得为奴隶主修造船舫、码头和送死卖命。由于大奴隶主贵族“兼并数万顷田”，迫使大部分自由民经济地位下降，“全无容针少地”，不少人沦为部民，成了部民制继续发展的牺牲者。至于家奴的处境就更为悲惨，奴隶主可以随意把他们杀戮和殉葬。

以皇室为中心的奴隶主阶级专政，极力维护部民制的生产关系。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不仅分别拥有自己的屯仓、田庄和部民，而且还分别拥有自己的武装。他们各霸一方，把山林、海滨、土地、水利资源做为自己的私产，并为争夺地盘，经常发动战争（“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向上缴纳贡物时，“先自收敛，然后分进”。这种具有分裂倾向的局面和

^① 日本皇室和大奴隶主贵族占有许多土地。皇室在中央和地方设置许多农庄，称为屯仓。各地方奴隶主也占有广大土地，设置自己的农庄，称为田庄。在屯仓、田庄中劳动的主要是部民。奴隶主为向外扩张侵略，在屯仓中养马、屯兵、贮积粮饷，因而它又成为军事和政治的据点。

你争我夺的战争，不仅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又使人民深受战争的灾难，越发激化了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这些都深刻反映了六世纪以来以部民制为主要形式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日本奴隶社会中，这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部民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部民和奴隶主阶级矛盾斗争的激化，是日本奴隶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

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不仅用自己的无穷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了日本的文明，而且从来也不屈服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部民以各种形式的斗争来反抗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起初，他们以逃亡的形式，摆脱奴隶主的控制，抗拒赋税徭役（“脱籍免课者众”）。有的三五成群，袭击奴隶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83页。

主的田庄、屯仓，这就是《日本书记》中多次出现的所谓“盗”、“贼”。到七世纪初，这种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来势越来越猛，发展为大规模的暴动。统治者惊呼：“强盗窃盗，并大起之，不可止”，正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极度激化和人民反抗斗争的高涨。

在人民斗争的冲击下，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摇摇欲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天皇所能直接支配的只限于王室领地和它的居民，国家也只是以王室为中心、由大小贵族联合的国家，因此，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五二七年九州北部筑紫国造盘井的“叛乱”，^①反映了地方豪族与中央豪族矛盾的尖锐和激化。这次“叛乱”持续了一年半之久，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危机，是奴隶主统治开始衰微的象征。盘井之乱后一百年左右，日本奴隶主的统治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奴隶主贵族大伴氏、物部氏^②互相争权夺利。六世纪末，大贵族苏我氏，又消灭了物部氏，

① 国造，地方官职名；盘井，地方豪族。从五、六世纪开始，日本中央统治力量逐渐向地方扩展，皇室和中央大贵族用各种方法夺取地方贵族的土地和部民，扩大自己的势力。地方贵族则要以赎罪、奉献的名义交出自己控制的田庄。中央和地方为争夺土地和部民的斗争十分尖锐，五二七年地方贵族盘井发动了武装反抗中央的“叛乱”，史称“盘井之乱”。

② 大伴氏、物部氏、苏我氏都是保留原来氏族名称的大奴隶主集团。他们都先后控制皇室，掌握朝政。

掌握了实权，威势凌驾于皇室之上。苏我氏和皇室之间曾因葛城县领地的归属而展开争夺，更加激化了他和皇室的矛盾。人民群众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小奴隶主贵族的联合专政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正如列宁在分析革命前夕形势的特征时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当时也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征：“（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①正是人民群众这种“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和顽强斗争，推动了日本历史的前进，使革新派有可能在中国法家思想的影响下制定革新路线。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社会制度变革的前夜。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20—621页。

(二)

“衰亡着的東西不願意輕易地死去，它們要為自己的生存而掙扎，堅持自己腐朽的事業”。^① 面臨奴隸制日趨崩潰的形勢，沒落奴隸主階級的代表蘇我氏，推行了一條堅持守舊，反對前進的反動路線。在政治上，蘇我氏“專擅國政”，頑固維護奴隸主的世襲特權和具有分裂傾向的奴隸主貴族專政。在經濟上，蘇我氏大肆兼併土地，任意擴大自己的屯倉與部民，竭力挽救即將瓦解的部民制。為了推行反動的政治和經濟路線，蘇我氏建立了龐大的軍隊，“家外作城柵，門旁作兵庫”，“起庫儲箭”，企圖用反革命的武裝鎮壓人民的反抗，維護奴隸主的垂危統治。

但是，與蘇我氏根本對立的另一條路線——主張前進、革新的路線，在鬥爭中，在中國法家思想的影響下，也逐步產生和發展起來了。

七世紀初，中國先秦法家著作已廣泛地傳入日本。聖德太子的改革，就是運用中國法家思想在日本進行變革的一次初步嘗試。聖德太子是日本新興地主階級

^① 斯大林：《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283—284頁。

革新派的先驱。他自幼就学习中国典籍，在其摄政期间（593—621年）曾几次派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说明了他追求中国先进思想的主观愿望。六〇三、六〇四年他先后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①其基本思想就是要变革、要前进，主要反映了中国法家思想。“宪法”主张“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二君，民无两主”，要“背私向公”，显示了中央集权的方向；“宪法”强调要“明察功过，赏罚必当”，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治思想；“宪法”提出“为官以求人，为人不求官”，意思是为了做好官而去寻求称职的贤人，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身分地位专门找官给他做。企图削弱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推行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另外，在“宪法”中，还直接引用了中国法家荀子、韩非子等人著作的辞句。圣德太子为以后的改革造了舆论，这次改革是大化革新的前奏。

圣德太子虽然提出了一些革新的思想，但在当时革新路线正处于摸索与形成过程中，他在主要接受中国法家思想的同时，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维护旧制度，主张复旧倒退的反动思想。由于圣德太子没有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主张“以和为贵”，企

^① “冠位十二阶”，以冠的颜色表示位阶高低的制度，分十二阶位。“宪法十七条”，是为圣德太子的施政理想，与今之宪法含义不同。

图在和苏我氏为代表的大奴隶主妥协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这就决定了改革的十分软弱和不彻底性。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次很不彻底的改革，也为以苏我氏为代表的旧势力所不允许。在圣德太子的政治生涯进入晚期时，苏我氏就进行了反扑。六二二年，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为了彻底扼杀革新事业，杀死了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皇子。圣德太子的理想连同他的不彻底的改革，一同成了儒家反动思想的牺牲品。

圣德太子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社会要前进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旧势力也阻挡不住的。历史也必然要造就出新的革新人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①继圣德太子之后，一些决心学习中国，立志在日本革新的人物又从奴隶主阶级中分化出来，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他们总结了圣德太子改革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革新路线，成为日本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

以中大兄为首的革新派路线的形成，中国法家思

^①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6—507页。

想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唐继隋之后建立了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从唐太宗到武则天，执行的是法家路线。在当时日本人眼里，唐朝是“法制完备的上国”，它对处于动乱、变革时期的日本，尤其对革新派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大化革新前夕，曾被圣德太子派往中国学习的留学生都陆续回国，他们深受中国唐初法家路线的影响。有些人例如僧旻、高向玄理等后来就做了革新领导者的参谋，起了骨干作用。根据现有史籍来看，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革新领导者，这时在思想上主要受商鞅等先秦法家的影响，在实践上是学习唐初法家路线的结果。

商鞅在《修权篇》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①日本革新派的路线贯穿了“权、法、信”的精神。

商鞅所说的“权”，就是向奴隶主贵族夺权，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中大兄总结了历史经验，认识到圣德太子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权掌握在苏我氏手中，不把政权夺过来，就谈不上改革。当时苏我氏的头子苏我入鹿掌握着实权，因此他们商定了首先刺杀苏我入鹿，然后夺取政权的计划，并进行了周

^① 《商君书·修权篇》。

密的准备。

商鞅所说的“法”，就是要实行法治，发挥地主阶级专政的作用。中大兄发展了圣德太子“明辨诉讼”的思想，明确提出“今克见人为制之始”。“为制”就是制定法律，意思是今后要按法律条文办事。革新派在夺权以后，立即颁布了一系列诏书，实际上是一些法律规定，以此打击奴隶主贵族，保证改革的进行。并且“设钟置匱于朝”，诉讼者可直接到朝中撞钟投状，朝廷对“不审听诉”的官吏要“以其罪罪之”，把审判权收归中央。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革新派的法治思想。

商鞅所说的“信”，就是要赏罚分明，说到做到，严格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以中大兄为首的革新派明确宣布“复当有信，可治天下”，意思是说新兴地主阶级要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体现他们意志的政策法令，要赏罚必信。革新派夺权后对派往各地之国司（地方官职名），区别优劣，予以赏罚，体现了赏罚必信的精神。

在“权、法、信”思想指导下，以中大兄为首的革新派形成了一条政治路线，就是反对分裂倾向，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废除奴隶制的所有制，建立封建制的所有制。这条路线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正确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革新派的路线一产生，就和苏我氏的守旧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愈来愈激烈，终于导致了革新派的武装夺权。六四五年六月十二日，革新派在经过周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之后，假借“三韩进调”举行“受贡”仪式（三韩是当时在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新罗、百济、高丽），将苏我入鹿诱入皇宫，发起突然攻击，中大兄皇子等亲自动手，杀死苏我入鹿。接着革新派又以吉野法兴寺（在今奈良县）为据点，组织军队，扩充军备，准备与苏我氏残余势力进行决战。由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苏我入鹿之父苏我虾夷自焚而死，苏我氏势力土崩瓦解。革新派迅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以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为核心，僧旻、高向玄理为顾问的新政权。

面对貌似强大的奴隶主阶级凶恶势力，以中大兄为首的革新派与圣德太子不同，他们不是用“以和为贵”的虚伪反动的儒家说教乞求恩赐，而是发扬“当今争于气力”的法家反潮流精神，抡起革新派的大刀把苏我氏砍下专权的宝座，摧毁了旧贵族势力。革新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暴力革命和反潮流精神的胜利。而新政权的建立，为贯彻革新路线，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开辟了道路。

(三)

斯大林指出：“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①日本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运用国家机器，开始了自己的革新事业。

首先他们立即向东国派国司，并在东国及倭六县（为天皇直辖地）实行造籍和校田，收集兵器。从六四六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经济上，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制”。奴隶主贵族私有的屯仓、田庄收归封建国家所有，部民转为封建国家的公民。政府对公民，每六年按人口颁给一次“口分田”，男子二段，女子为其三分之二，私奴婢给良民的三分之一。他们对土地仅有占有权和使用权，死后须归还国家。受田人要担负租、庸、调。^②为此政府还建立了户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第4页。

^② 租，田租，每段稻二束二把。庸，力役，每年十天，经常延至三十天，可用实物代替。调，按地方土产征收，一般交纳布或绢，每户一丈二尺。

籍、计账制度^①，做为束缚人民，进行封建剥削的根据。这样原来的部民就成为“班田制”下的农民，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建立起来了。

在政治上，废除了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新政权刚一建立就宣布了“帝道唯一”这一指导思想。六四九年，诏博士高向玄理与僧旻置“二官八省”，确立了中央官僚机构。在地方设置了国、郡、里三级行政组织，分别有国司、郡司、里长治理，把地方置于中央直接控制之下。实行征兵制，由中央掌握军队。同时，制定了冠位制，六四七年制定冠位十三阶，六四九年制定冠位十九阶，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对国家官吏授与位阶与官制，并根据其地位高低，授与位田、职田、功田等，“大夫”以上给予“食封”。由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结束了原来奴隶主贵族各据一方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此外，新政权还废除了奴隶制的殉葬制，为发展封建经济，下诏劝农，奖励农业生产。

大化革新标志着在日本封建制取代了腐朽没落的奴隶制。这个社会大转变所以能够完成，固然是日本社

^① 户籍，登记每户人口的姓名、年龄；计账，登记每户劳力和应负担的赋税。

会内部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革新派吸取中国法家思想，结合日本社会的具体情况，执行了一条正确的革新路线的结果。当时，唐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设置“三省六部”，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打击了分裂割据的豪强势力。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积极意义的。唐朝还推行“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的法治路线和“务取实才真贤”的任人唯贤的政策，严厉镇压保守势力，抑制豪门地主，提高庶族地主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同时，唐朝还奖励“耕”“战”，重视和外国的文化交流。日本革新派正是吸取了中国唐初的政治经济制度，制定了自己的改革措施。例如，日本的“二官八省”、“国、郡、里”行政机构以及“班田制”的土地制度，都分别受到了唐初的“三省六部”、“州、县”两级制及“均田制”的影响。

大化革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据《日本书记》记载，当新政府宣布革新措施时“百姓大悦”，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情景。新兴地主阶级正是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才得以实现这场由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改革。

但是，必须指出，中大兄皇子等革新派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改革只能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

另一种剥削制度。部民解放了，但劳动人民又被套上了新的封建压迫的枷锁，而且奴婢依然没有解放。奴隶主贵族在封建化的过程中依然保留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某些特权。同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革新派有可能对旧势力做出妥协和让步，其中某些代表人物甚至会转到旧势力一边，成为革命的障碍。这是由于他们剥削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日本封建制是在激烈的 反复辟斗争中确立的

日本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历史，充满了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复杂的斗争，提供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总结这些经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将加深我们对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认识，提高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一)

六世纪中叶，日本奴隶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部民制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奴隶主贵族专政顽固地维护腐朽的奴隶制度，阻碍社会前进，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人民群众用逃亡和暴动等方式反对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埋葬旧的奴隶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

要求。

在人民群众反抗浪潮的推动下，以中大兄皇子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大兄总结了圣德太子改革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吸取了中国先进的法家思想，形成了一条革新路线。六四五年六月，以中大兄为首的革新派，用暴力从奴隶主大贵族苏我氏手里夺取了政权，为革新开辟了道路。

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建立以后，在经济上，废除奴隶制的部民制，实行封建土地国有制“班田制”，奴隶主贵族的私地、私民，脱离了他们的直接支配，变为国家控制的公地、公民，改变了奴隶主贵族无限制榨取人民的状况。在政治上，废除奴隶主贵族专政，确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被取消了，从而改变了具有分裂倾向的分散局面。

但是，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不甘心失败，他们“**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①妄图恢复失去的天堂。六四五年九月，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建立不到三个月，以古人大兄皇子为头子的复辟势力，企图乘新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古人大兄是苏我氏在皇室的代理人。在革新派用暴力夺取政权、诱

^① 马克思，《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第363页。

杀奴隶主贵族苏我入鹿时，他曾哀叹“吾心痛矣！”^①革新派夺取政权以后，他便以出家为名，跑到吉野法兴寺（在今奈良县），纠集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妄图推翻新政权。中大兄及时发现了他的阴谋，当机立断，派兵镇压了这场叛乱，巩固了新政权。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复辟势力也变换了破坏方式。他们挑拨离间，在革新派内部制造分裂。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②是从苏我氏中分化出来的革新人物，在革新派夺取政权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复辟势力对他恨之入骨。六四九年，苏我氏残余势力苏我日向，向中大兄诬告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谋反，迫使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自杀。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之死，是革新派的一大损失。但中大兄很快搞清了事实真相，识破了苏我日向的阴谋，把他贬职到九州筑紫地方当大宰帅。复辟势力的离间计，虽一时得逞，但终究不能阻挡革新事业的前进。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革新派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曾因不满苏我氏专权而站到革新派一边的孝德天皇，

① 引自《日本书记》。本文所引材料，凡见《日本书记》的，以后不再注明出处。

② 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是大化革新的骨干之一，参加了六四五年六月十二日刺杀苏我入鹿的行动，革新政权成立时曾任右大臣。

由于深受儒家保守思想的影响(“为人柔仁好儒”),反对中大兄的法治路线,转到了复辟势力一边,成为复辟势力在革新派内部的代理人。六五三年,为了控制和镇压飞鸟地方(在今奈良县)的复辟势力,中大兄决定新政府从难波(今大阪)迁至飞鸟。孝德天皇反对,陷于极端孤立,后来郁闷而死。孝德天皇之死,消除了新政权内部的隐患。

复辟势力虽然一次又一次的遭到失败,但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的复辟活动变得更加隐蔽,更加狡猾。六五八年,以苏我赤兄为代表的复辟势力,先挑动孝德天皇之子有间皇子谋反,后因时机不成熟,又大耍两面派手法,向中大兄告发,骗取信任。中大兄镇压了有间皇子,但苏我赤兄却因此成了中大兄的心腹,隐藏在新政权内部。这样就给以后的革新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

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的种种阴谋手段,无论是公开的武装叛乱,还是隐蔽的破坏活动,无论是挑动革新派的分裂,还是在革新派内部寻找代理人,归根结底,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变革新路线,颠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复辟奴隶制。大化革新正是在这场激烈的反复辟斗争中进行的。也正由于这一时期中大兄比较坚决地镇压了复辟势力,才初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二)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新兴地主阶级也具有两重性。它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又有保守性的一面。它的革命性表现为以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它的保守性则表现为对奴隶主阶级的妥协退让，同时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就以日本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中大兄来说，也具有十分明显的两重性。

中大兄出身皇族，是从奴隶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和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所领导的革命，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这场革命是不可能彻底的。在建立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还保留着奴隶制的残余。虽然部民解放为公民，但并没有解放奴婢和品部、杂户。^①依照“男女法”的规定，奴婢被视为“贱民”，贵族可以拥有奴婢。品部、杂户继续隶属于封建国家，仍保持其部民的地位。奴婢和品

^① 在日本奴隶社会，部民的数量和种类相当多，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民称“田部”、“舂米部”等，改革后他们转化为公民。品部、杂户是部民的一种，从事手工业生产及其他杂役，如“衣缝部”、“锦织部”、“鞍部”等，一般由有手艺的归化人组成，改革后他们的地位并无变化。

部、杂户在当时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虽然改革后，奴隶主贵族转化成封建国家的官吏，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发生一定的变化，但仍旧保有一定的特权，如可以位田、职田、功田等名义占有土地，有的还享受食封。因而旧奴隶主贵族还保留着相当的政治经济实力，这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成为复辟的温床。

中大兄在取得政权并初步巩固后，陶醉在一片胜利声中，忘记了复辟势力还存在。他虽然发现有人谋反，但只是处死几个谋反者，并没有去寻求其根源所在。在中大兄看来，夺得了政权并进行一定的改革以后，便大功告成。

六五二年，“班田既讫”，土地制度的改革初步完成。从此以后，中大兄再也没有什么革新措施了。他的革命性减弱了，而保守性却不断增长。齐明年间（655—661年）大造宫殿，“时好兴事”，大量征发徭役，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沉重的徭役和赋税，使劳动人民怨声载道。这对刚刚建立的新的封建制度起着破坏作用。这种情况表明，中大兄已开始走下坡路了。

为了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六六一年中大兄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企图把国内矛盾转向国外，但遭到惨败，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复辟势力借口追究战争失

败责任，公然对新政权施加压力，暗中则编造谣言，蛊惑人心，制造混乱（“童谣亦众，日日夜夜失火处多”）。中大兄这时由于地主阶级保守性已占了主导地位，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感到自己力量单薄，再也无法同复辟势力进行阶级较量。为了取得旧势力的欢心，六六四年，宣布“增换冠位阶名及氏上、民部、家部等事”，从此执行了一条妥协倒退的路线。

氏上制是世袭的奴隶制等级制度。中大兄不仅肯定了这种制度，并赋予了一定的权力标志，“其大氏之氏上，赐大刀。小氏之氏上，赐小刀”。同时“亦定其民部家部”，部分恢复了大化革新时曾经废除的部民制，让那些豪门贵族重新享有特权，并得到国家的承认。六六八年，中大兄即位，史称天智天皇。即位后，中大兄一面沉醉在和旧势力的妥协之中，“朝廷无事，游览是好”，^①骄奢淫逸，纵情享受。一面又于六七〇年下诏“禁断诬妄妖伪”（严禁批评朝政），压制人民的不满情绪，并编制户籍，“断盗贼与浮浪”（取缔人民的暴力反抗和逃亡），镇压人民反倒退的斗争。

中大兄的妥协倒退路线给复辟势力造成了可乘之机，复辟势力大肆活动。在他们的鼓动下，六七一年，

^① 引自《藤原家传》。

中大兄改组政权，任命其子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主持朝政。大友“雅爱博古”，“广延学士”，“以为宾客”，^①深得复辟势力的拥戴。中大兄想由大友继承皇位，任命苏我赤兄等五大臣辅佐大友。苏我赤兄窃取了左大臣的要职，其地位仅次于太政大臣。经过这番改组，革新政权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权力已被复辟势力所掌握。大友任太政大臣后，首先“奉宣施行冠位法度之事”，颁布“近江令”。^②“近江令”虽然没有留传下来，但从当时政治形势可以推知，这个法令只能主要是反映复辟势力的愿望和要求。同年年底，中大兄病死，大友继位，政权完全落到复辟势力手中。大友继位后，复辟势力纷纷被起用，如因参与有间皇子谋反事件而被流放的境部连药被任命为将军。复辟势力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妄图完全复活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这样，复辟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革新政权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由于中大兄后期执行妥协倒退路线，由于复辟势力的阴谋活动，一度得而复失。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但是，“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

① 引自《怀风藻》。

② 近江，地名，在今滋贺县。六六七年天智天皇(中大兄)迁都近江。所颁法令以都城命名，称“近江令”。

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①复辟势力暂时得逞，只能影响历史发展的速度，既不能阻止历史的前进，也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三)

中大兄的妥协倒退，复辟势力的篡权，把一个新的课题摆在人们面前：是坚持大化革新的方向、把历史推向前进，还是违背大化革新的方向、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各阶级、各阶层都要作出自己的抉择。

人民群众是倒退复辟的直接受害者，他们首先起来反抗。齐明年间，征发大量的农民，修建规模庞大的宫殿，用三万人挖渠运石，七万人堆筑假山。劳动人民不堪忍受沉重的徭役负担，他们斥责这条渠是“狂心渠”，又诅咒说：“作石山丘，随作自破”。恢复部民制使广大农民有重新沦为奴隶的危险，人民群众决不容许社会倒退。他们纷纷逃亡，甚至拿起武器，聚集山林，进行反抗。中大兄虽然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但是人民群众对复辟奴隶制的愤恨和反抗是压制不下去的，他们咒骂“天皇天命将及乎”（快要完蛋了）。大友

^① 毛主席：《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1061页。

继位后，复辟势力把持了政权，人民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孕育着一场即将爆发的反复辟的革命风暴。

中大兄对复辟势力的妥协，也引起了新兴地主阶级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大海人皇子为代表的革新派，坚持革新路线、反对妥协倒退，同中大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大海人虽不是革新派的核心成员，但在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锻炼出较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革新派内部享有较高的威信，并具有一定的地位。齐明年间发动侵朝战争时，他已担任留守官，后被立为皇太子，是中大兄的法定继承人。大海人参与了大化革新的全过程，目睹了妥协倒退路线的危害。为了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刚刚建立的政权，他同中大兄之间产生了矛盾，并逐渐公开化。六六八年，中大兄带着群臣到蒲生野游猎，在一次宴会上，正当“酒酣极欢”，对此极为不满的大海人愤怒地“以长枪刺贯敷板”，引起中大兄大怒，几乎被杀。^①在中臣镰足等大臣的劝阻下，才免一死。

围绕在中大兄周围的旧贵族们，把坚持革新路线

^① 引自《藤原家传》。

的大海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排斥大海人。六七一年，中大兄任命他所宠爱的大友为太政大臣，就是要剥夺大海人的皇位继承权。同年，中大兄病危，诏大海人，以托付后事进行试探，欲谋杀害大海人，排除大友继位的障碍。大海人识破了他的阴谋，巧妙地以出家为名，避居吉野，毅然同中大兄决裂，脱离了危险境地。

反动阶级总是首先把刺刀提上日程。避居吉野的大海人在复辟势力看来，如同“虎著翼放之”，他们十分恐惧，必欲置之死地才安心。中大兄一死，大友复辟政权调兵遣将，进逼吉野，挑起了战争。面对这种危急的形势，在人民群众反复辟斗争的推动下，大海人终于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六七二年（壬申年）六月二十二日，大海人果断地决定：派人前往美浓国（今岐阜县），征调其食封地安八磨郡的军队，并经东国国司征集各郡军队，抢先占据不破关口。一场新兴地主阶级领导的反复辟战争开始了。

以大海人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在战争中曾宣布口号：“其发兵之元意，非杀百姓，是为元凶”。这反映了他们起兵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复辟政权，继续进行革新事业。

大海人反复辟的行动，得到革新派广泛的响应。

他们纷纷脱离盘据近江的大友复辟政权，争相投奔大海人。进军途中，大海人不断得到不满复辟政权的东国地方官吏军事上物质上的支援。这样迅速壮大了力量，形成了一支反复辟大军。大友复辟政权妄图趁大海人兵力不足，立足未稳，消灭大海人的力量，但两次派兵侵袭不破关口均遭失败。大海人逐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大海人军队不断打击下，大友军屡遭挫折，节节败退。七月二十二日两军在濑田（在今滋贺县）决战。大海人的军队一举歼灭敌军。走投无路的大友于七月二十三日自缢而死。历时三十二天的反复辟战争（史称“壬申之乱”）结束了，大海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这场反复辟斗争迅速取胜的决定性因素。

“壬申之乱”前夕，人民群众中孕育着的反复辟革命风暴，日趋成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大海人发动了反复辟的革命战争。他的行动，立即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许多猎户、奴隶踊跃参军，与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汇集一起，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他们积极投入战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是因为劳动人民“极度憎恨旧的秩序，他们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了现制度的一切重担，他们自发地渴望从这些重担下解放

出来并找到美好的生活。”^①当大海人的军队与大友军战于葛下郡苇池，“时有勇士来目者，拔刀急驰，直入军中，骑士继踵而进之，则近江军（即大友军——引者）悉走之”。在另一次战斗中，大海人军遭敌军袭击，其时大井寺五名奴隶参军为先锋，“以进射之，敌军不能进”，扭转了战局。在濑田决战中，有勇士“以重环甲拔刀”直冲敌阵，“众悉乱而散走之”。这些勇士和奴隶们的勇敢行动，激发了士兵们的斗志，在关键性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进军的前夕，大海人对能否取得战争的胜利，信心不足。他看到大友拥有“左右大臣及智谋群臣”，凡事可“共定义”，而自己身边“无与计事者”。然而正是这支既无左右大臣，也无“智谋群臣”的反复辟大军，摧枯拉朽地消灭了腐朽没落的复辟政权。这是因为“**人民，这个最后的、最高的审判官，又重新出现在舞台上**”。^②倒行逆施的复辟势力，终究逃脱不了人民的审判！

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倒

① 列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52页。

② 恩格斯：《反革命的进攻和革命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577页。

退是可能的，但新兴事物必然要战胜腐朽力量。大海人从吉野出发时，仅有二十余人，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他们进行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正义的事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相反，大友复辟政权虽然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事力量，但是大海人一起兵，他们的虚弱本质就暴露出来了。“其群臣悉愕，京内震动”，有的弃官隐藏山泽，有的私逃东国，投奔大海人。大友派到各地去的发兵使者，无不空手而回。筑紫、吉备的地方官们违抗朝廷的命令，用各种借口，拒绝出兵。失道寡助、人心背离的大友复辟政权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战场上，将领们各怀异心，步调不一。派去袭击不破关的部队，尚未接敌，将领们先就自相残杀起来。士兵们不愿为复辟政权卖命，纷纷倒戈。貌似强大的大友复辟政权，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在革命暴力的打击下，腐朽没落的大友复辟政权土崩瓦解了。新兴地主阶级经历了曲折反复的夺权过程，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就再一次证明，新生事物战胜腐朽势力，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壬申之乱”在日本封建制建立的过程中，有着重

要的意义。

大化革新是以中大兄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为反对奴隶主贵族专政，进行封建制的改革，发动的武装夺权斗争。这一场夺权斗争波及的范围较小，参加的阶层不广，因此革命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一定的局限。“壬申之乱”则是坚持革新路线的大海人为继续大化革新的事业，在人民群众反复辟的浪潮中，发动的一场较为广泛的革命战争。由于这场战争决定着社会的前进与倒退，迫使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都卷入其中，因而战争的结果，更加深刻地改造了社会。

(四)

在反复辟战争中，以武力夺得政权的大海人，于六七三年即位，史称天武天皇。大海人曾在中大兄身边亲眼目睹了激烈的阶级斗争，看到了奴隶主贵族怎样变换手法进行复辟活动；看到了中大兄从革新向倒退的转变；看到了人民反复辟斗争的巨大力量。因此，他坚持革新路线，继续大化革新的事业，而把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

复辟势力的元凶大友在反复辟的战争中被消灭了。战争结束后，大海人又对其它主要罪犯进行了严厉

的惩处，“重罪八人坐极刑”，苏我赤兄及其子孙皆被流放。这就清除了一批奴隶主复辟势力。

奴隶主贵族复辟的严重阶段已经过去，但是，“一种社会制度之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乃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①只要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没有结束，奴隶主贵族就必然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成复辟行动。大海人掌权期间，复辟活动的势头有所减弱，但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时而妖言惑众，扰乱人心；时而“指斥乘輿”（责骂朝廷），攻击革新政权；小规模的地方叛乱接连发生。

大海人吸取了地主阶级政权得而复失的教训，认识到不用暴力粉碎复辟活动，政权就不能巩固，革新路线就不能贯彻执行。因此他明确提出：“凡政要者军事也”，把加强军事放在巩固政权的头等重要地位。大海人在执政期间，经常下令奖励文武百官骑马、练武、习阵法，派官吏到各地校兵，并亲自检阅军队和装备。这些措施巩固了革新政权。

在打击复辟势力、加强军事的基础上，大海人为了完成大化革新的事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了更深入的改革。

^①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15页。

在经济方面:(1)彻底废除部民制:人民反对复活“部民制”的斗争,教训了大海人。六七五年,他发布诏书:“甲子年(664年)诸氏被给部曲者,自今以后除之”,废除了中大兄后期一度恢复的部民制。同时,诸王诸臣占有的“山泽岛浦,林野坡池”也收归封建国家所有。这样,奴隶制的最后一块重要阵地被扫除了。

(2)取消食封:大化革新废除了私地私民,但作为补偿,实行了食封制。奴隶主贵族利用食封做为复活活动的经济基础。大海人吸取了中大兄的教训,采取措施,逐步取消食封制。首先在六七六年,对那些被授食封的贵族“除以西国,相易给以东国”,用这种转移封邑的办法,使他们不至形成地方势力。接着,六八〇年更进一步规定“有食封者,先后限三十年”,年满则国家收回,从而加强了国家对贵族经济力量的控制。经过改移封地,限制年限,在六八二年最后废除了食封制,“亲王以下,至于诸臣,被给食封皆止之,更返于公”。国家掌握了全部土地和租税,巩固了封建土地国有制——“班田制”,扩大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

(3)发展封建经济:大海人比较注意恢复和发展因中大兄后期妥协倒退而受到破坏的社会经济。当时徭役和农业生产的矛盾最为突出。大海人在他执政十五年中,多次想兴建都城,都因考虑到中大兄的教训,

而未敢修建。因此，这时的徭役征发是比较少的。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剥削来源，大海人派官吏到地方按贫富“简定三等，仍中户以下，应与贷”，使那些刚从部民制解放出来的班田农民有生产的可能。此外还禁止杀牛马等耕畜，并“劝植桑、纈、梨、栗、芜菁等草木，以助五谷”。“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①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表现在农业生产上普遍使用铁犁，封建统治者也奖励制造各种农具，甚至可以用农具纳税。同时，耕作技术不断改进，产量提高。封建经济繁荣，国家财力充足。

在政治方面：（1）排除大贵族势力，加强皇权；大海人执政期间，没有轻易任命一个大臣，统治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凡是重要的事情都委托皇族去作，以防止复辟势力钻进革新政权内部，夺权复辟。为了保障皇族在整个统治阶级中的最高地位，大海人于六八四年“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建立新的封建等级制度。新制度重新调整了各氏姓的位次，皇族称为真人，列在八姓之首。这些措施加强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49页。

(2) 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依靠新兴地主阶级中下层：大海人吸取了中大兄只依靠少数大贵族的教训，认识到只有依靠整个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政权才能巩固。他注意听取中下层官吏的意见，对有利于统治的意见，则“立为法则”予以实行。选拔官吏的标准，据后来“大宝律令”的规定：“凡应选者皆审壮迹，铨拟之日，先进德行，德行同，取才用高者，才用同，取劳效多者”。^①对有能力的人，不问身分和等级高低，加以提拔重用，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为了这一需要，又扩大了冠位制，将官阶增加到四十八阶，使中小地主有登上仕途的机会。这样，扩大了统治基础，各级政权牢牢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手里。

(3) 制定律令，健全国家机构：大海人于六八二年“定律令，改法式”，将“近江令”中包含的复辟倒退内容予以删除，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②后来又在这一基础上，修改而成“大宝律令”。^③“飞鸟净御原令”和“大宝律令”是日本封建社会初期的基本法。它完整地规定了封建制国家机构和社会制度，用法律形式将大化

① 《令义解》卷四选叙令，《国史大系》第125页。

② “飞鸟净御原令”，是以天武天皇的宫殿——飞鸟净御原宫命名的。

③ “大宝律令”，文武天皇大宝元年（七〇一年）制定，故以此命名。

以来的革新成果固定下来。律令的制定，成为强化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

大海人在日本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过程中，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坚持推行革新路线，在日本确立了封建制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他的进步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的重大进步。“可是，这个革命用农奴主和农奴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代替了奴隶主和奴隶占有制的剥削形式。一些剥削者被另一些剥削者代替了。”^①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一对抗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大海人毕竟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执行革新路线的同时，有着剥削压迫人民的一面。他用强力将人民束缚在土地上，“凡浮浪人，其送本土者，犹复还到（若再逃亡），则彼此并科课役”。注重军事，也反映了害怕人民，镇压人民的一面，因此，严令民间各种兵器“不应存私家”，这些正表明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

^①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215页。

论古代世界封建制取代 奴隶制的斗争

在世界历史上，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经历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形式多种多样，内容生动丰富，过程迂回曲折，向我们揭示了社会制度大变革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今天，我们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用马克思主义剖析世界上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历史，总结其经验，会有助于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一步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去进行新的更加伟大的斗争。

(一)

古代世界各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都带有各自的特点，经历过不同形式的斗争。但是，社会制度的更替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都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奴隶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正是封建制取

代奴隶制的变革的根本动力。

在奴隶制度下，奴隶和其他劳动群众是生产斗争的主力军。由于他们的长期生产实践，发展了生产技术，改进了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力，推动着奴隶社会向前发展。虽然各地区各国家开始向封建制转变的时间不同，但是到奴隶社会末期，各奴隶制国家的生产力都有了显著提高。中国开始出现铁器、牛耕；日本比较广泛地使用铁器；罗马的农业生产也有了不小进步。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封建经济的萌芽。中国的“初税亩”、罗马的“隶农制”就是标志。这种日益发展的生产力同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激化，酝酿着社会革命的到来。

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一方面，更加残酷地榨取奴隶的膏血，镇压奴隶的反抗；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扼杀封建经济的萌芽。罗马帝国就曾颁布各种法令，妄图强迫隶农倒退到奴隶的地位上去。它倒行逆施的结果，致使生产下降，经济萎缩，农业和工商业严重破坏，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恩格斯指出：**“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①事实表明，只有扫除奴隶制这个绊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46—147页。

脚石，封建制才能得到发展，历史才能前进一步。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斗争。奴隶社会末期，奴隶群众反抗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和残酷压迫的斗争，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形式，波澜壮阔，此伏彼起。在中国，有陈国的筑城奴隶把奴隶主庆虎庆寅杀掉；卫国手工业奴隶暴动，把奴隶主头子卫侯辄赶跑；最著名的是发生在公元前六世纪由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柳下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奴隶主贵族望风逃窜，受到沉重打击。在日本，史书记载，七世纪初“盗贼”大作不止，表明此伏彼起的奴隶斗争一浪高一浪，根本镇压不下去。从三世纪到五世纪，整个罗马帝国烽火连天，奴隶起义接连不断。公元二六三年，奴隶革命的中心西西里再度爆发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紧接着，高卢（现在法国）地区的巴高达（意为战士）运动，战火越烧越旺。起义的奴隶杀死奴隶主，烧毁城市，占领田庄，没收和分配奴隶主的财产，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正是这种风起云涌的奴隶反抗和奴隶起义，把奴隶制经济打得破烂不堪，濒临崩溃；把奴隶主的国家机器打得四分五裂，摇摇欲坠，使得整个奴隶制度衰微破败，奄奄一息，为新兴封建主登上政治舞台，向奴隶主贵族展开夺权斗争造成了革命形势。如果没有广大劳

动群众的支持和参加，封建主夺权斗争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主要是因为，新兴封建主和奴隶主从力量对比来看相差悬殊。奴隶主阶级虽然处于没落过程，但有着一、二千年反动统治的经验，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依靠着深厚的社会根基和传统势力，一时还显得强大。而封建主刚刚兴起，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在人数上又占少数，只有在斗争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才可能化劣势为优势，打败奴隶主，取得夺权斗争的胜利。中国的“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等夺权斗争，都是争得了奴隶和平民的支持和参加，才取得胜利的。

新兴封建主夺取政权后，一般都要通过变法，进一步改变奴隶制的所有制为封建制的所有制，巩固自己的政权，实现本阶级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中国有“商鞅变法”，日本有“大化革新”，分布在西欧、北非的日耳曼封建国家，也实行过一些改革。这些变法，不同程度地打破了奴隶制的土地制度、等级制度，建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定程度解放了生产力，因而得到奴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商鞅变法，“秦民大悦”，“山东之民，无不西向”；日本大化革新，“百姓大悦”，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正是由于有了人民的支持，这些变法才能打败奴隶主的节节抵抗，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而这些变法所表现出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也

是由于封建主阶级终归是一个剥削阶级，决不可能真正发动人民参加斗争，甚至害怕人民群众。这是各国变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活动都受到限制的原因。

(二)

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要维护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必须夺取政权，争得政治上的统治。而垂死的奴隶主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自动交出统治大权，他们依靠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的力量拚命进行抵抗。因此，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的斗争，必然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新兴地主阶级靠什么夺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呢？靠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靠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

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过程中，新兴的地主阶级处于生气勃勃的上升时期，他们的经济要求和政治主张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所以他们能够提出一条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路线，能够夺得政权，取得胜利。

但是，地主阶级的这条正确路线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头脑中固有的，而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正如本文前面谈到的，声势浩大、范围广阔、经

年不息的奴隶起义和斗争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奴隶制，深刻地改造着整个社会，这种斗争必然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地主阶级思想家总结了本阶级与奴隶主阶级长期、反复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才提出了这条路线。

通过分析各国情况，我们看到，用暴力推翻奴隶主专政，夺取政权，建立封建国家，这是新兴地主阶级革新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封建国家的建立，西欧封建国家的建立，都说明了这一点。日本的两次改革：圣德太子企图在和奴隶主集团妥协的前提下实现他的政治主张，结果证明是行不通的；而大化革新的成功，正是由于以中大兄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首先用暴力推翻了奴隶主政权，为改革创造了条件。两次改革，两种结果，说明了路线正确与否的重要性。事实表明，路线是否正确，决定了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的成败。同时历史还向我们表明：“**任何真正的革命进步都要吸引更多广大的群众参加运动**”。^①正是因为新兴地主阶级提出的正确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线，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在打击奴隶主、摧毁奴隶制、解放生产力等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客观上符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

① 列宁：《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393页。

求，因而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才使得这条路线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就充分说明，归根结底，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

(三)

新兴封建制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长期、激烈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封建主夺取政权之后，奴隶主贵族为了恢复失去的天堂，凭借他们在各方面还相当顽强的势力，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向新政权展开了全面的反扑。他们诽谤新法令，抗拒新制度；他们结党营私，挑拨离间，多次发动反革命政变；他们顽固维护和扩大旧的经济制度的残余，妄图破坏生产发展，极力开倒车。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的复辟势力往往要在新的政权中寻找或安插代理人以图从上到下篡夺政权、改变路线，达到复辟目的。中国秦朝的赵高，日本大化革新时期的苏我赤兄都是这一类用挖心战术搞反革命复辟的典型人物。还必须指出的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活动总是相互呼应的。国内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往往勾结国外的反动力量，而国外的反动力量也往往从国内找寻代理人，采取武装干涉的办法，进行颠覆活动。奴

隶制的东罗马颠覆意大利和北非的东哥特、汪达尔等新兴封建国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活动如此猖獗，目的就是要改变新兴封建主革新进步的路线，全面复辟奴隶制。

有复辟就必然有反复辟。新兴封建主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曾经镇压奴隶主的复辟活动。秦始皇剪除了吕不韦、嫪毐反革命集团，“焚书坑儒”，清除了一批奴隶主复辟势力；中大兄在夺取政权之后果断地平定了以古人大兄为首的反革命政变。然而，新兴封建主毕竟是剥削阶级，他们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镇压是不彻底的。稍有成绩，往往陶醉于“黔首安宁，不用兵革”，沉浸在“朝廷无事，游览是好”的“太平景象”之中，而为奴隶主复辟造成可乘之机。因之，单靠封建主本身的力量是不可能把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的。只有人民群众的斗争，才是彻底摧毁复辟势力、巩固新兴封建制的决定力量。例如，当野心家赵高发动沙丘反革命政变，篡夺了秦王朝的政权之后，封建主阶级的政治家李斯等人束手无策，不知所措。是伟大的农民英雄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以气吞山河的浩大声势掀起反复辟的革命风暴，不到三年就推翻了赵高复辟政权。又如，日本

大海人所进行的反复辟战争，东哥特托提拉所进行的反复辟战争，都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推动下，才发动起来的。大海人所进行的战争，因为有人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持，仅仅用了三十二天的时间，就打败了复辟势力，取得了胜利。托提拉的战争因为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而暂时失败了，但仍给予复辟势力以很大打击，人民的历史功绩乃是不可磨灭的。

无数事实表明，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劳动群众是反复辟的中流砥柱，他们对奴隶主的复辟活动，感觉最敏锐，反抗最迅速，斗争最坚决，是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新兴封建主所不能彻底完成的反复辟任务，最终消灭了复辟势力，巩固了新制度。正如恩格斯在总结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指出的：“**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①同样，新兴封建主夺权斗争，反复辟斗争的胜利，也是广大劳动群众为它争得的。

新兴封建主革新进步的路线在反复辟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这条路线是在劳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逐渐完

^① 恩格斯：《普鲁士“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325页。

善起来的。在此期间，经过几度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走了一个“之”字形的曲折道路。在中国，从商鞅变法，经过韩非总结提高，到西汉初期才逐渐完善起来；在日本，从圣德太子改革失败，经过中大兄的曲折反复，到大海人才逐渐完善起来。革新进步路线完善的过程，也就是它发挥作用的过程。依据这条路线制定的一系列反复辟的重要措施，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有利于社会的前进、发展，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反复辟斗争中每战胜一次复辟势力的破坏和进攻，必然促进新兴的封建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而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仍然是伟大的劳动人民群众。

(四)

纵观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历史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社会制度之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乃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①经过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过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搏斗和较量，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社会制度的

^①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15页。

大变革在斗争中实现了。

封建制战胜奴隶制的斗争说明了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革命成败的极端重要性。有了一条正确路线，才能制定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在夺取政权后，有了一条正确路线，才能时刻警惕反动阶级篡权改线的阴谋诡计，粉碎例如赵高、苏我赤兄一类反革命两面派、野心家、阴谋家的复辟企图。现代的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就是通过篡夺政权、改变路线，在列宁主义的故乡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叛徒刘少奇、林彪一伙，也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总结历史的经验，我们要更加自觉、坚定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①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成功。请看：人民群众一起来，中国的西周王朝垮台了，日本的大和朝廷灭亡了，地跨欧亚

^①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98页。

非三洲的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了。历史雄辩地证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民群众比古代更加发挥了高得无比的创造力。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宰割世界人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长期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互相支援，互相鼓舞，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全世界人民，包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挫败超级大国、特别是那个和平经念得最起劲的超级大国的种种阴谋诡计，取得更大的胜利。

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这种斗争，在中国，从商鞅变法到汉宣帝时期，大约经过三百多年；在日本，从大化革新到奈良时期，斗争了大约一百五十年；在罗马，斗争时间短一些，但

① 毛主席：《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1091页。

②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932页。

也斗了一个世纪左右。这种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公开的和隐蔽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等等。各国新兴封建主阶级都经过几度得权失权的反复，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最后，由于人民群众力量对复辟势力的打击，才巩固了政权。

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要经过如此长期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要最后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阶级，斗争必定更加尖锐、复杂，而且必定是长期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①正如封建制必然要取代奴隶制一样，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奋斗，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①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古代世界“尊天命”和 “反天命”的斗争

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深入批判，我们看到，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思想根源。而反动的天命论就是其思想渊源之一。林彪一伙自比“天马”，自称“天才”，狂妄地宣称他们的复辟梦想是“受于天”的，这充分说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天命论的尊崇者。历史上，“尊天命”与“反天命”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已有几千年了。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试图通过分析古代世界史上一些国家“尊天命”与“反天命”斗争的情况，总结历史经验，以期进一步批判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一)

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异常低下，人们对自然

灾害无法抗拒,对自然界发生的很多现象不能解释,对自己身体的构造,以及梦境、思维等精神现象无法说明,感到好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自然界,于是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迷信思想。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的宗教思想开始被剥削阶级所利用,并从中发展出一种天命观思想,作为麻痹欺骗人民的工具。

奴隶社会初期,奴隶主不仅剥削奴隶,而且还力图奴役本氏族的广大平民。所以广大平民和奴隶反剥削、反奴役的斗争,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奴隶主阶级一方面要用暴力残酷镇压广大平民和奴隶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利用天命思想来欺骗愚弄人民。他们极力把自己渲染成“神的儿子”,是“天的意志的代表者”,只有他们才能主宰世界。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曾经宣称自己是“神所创造的帝王的后裔”,是“神召唤我治理人民并把幸福赐给国家”的。我国最初的奴隶社会夏朝,奴隶主一开始就利用“天命”欺骗、压迫人民,如《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广大平民和奴隶是当时生产斗争的直接参加者,同时,遭受着奴隶主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种经济地位和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

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反对统治阶级的天命观。这种反天命的思想记载虽然很少，但我们可以从保留下来的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看出。例如，古代埃及的文学作品《绝望者同自己灵魂的谈话》，明确反映了劳动群众对神的存在产生了怀疑，他说神是不是存在，我也没见到。古巴比伦的文学作品《奴隶和主人的谈话》中，奴隶明确表示，“谨守宗教指令，向神供奉祭品，希望在死后得到好报，都是荒唐无稽的”。他们认识到盲目信赖鬼神，是得不到好处的。被压迫阶级不仅对天命思想发生了怀疑动摇，而且还采用怠工、逃跑等斗争形式来反对奴隶主的统治，对天命进行了直接的批判。希腊荷马时代《奥德赛》史诗中说：“如果主人不加以督促”，奴隶们“就不会老老实实去劳动”。这透露出奴隶们用消极怠工的方式，对抗奴隶主的剥削压迫。在古巴比伦和埃及也发生过平民和奴隶的反抗斗争。

与此同时，在广大平民和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推动下，奴隶主内部的斗争也激烈起来。最初奴隶制国家的当权者大部分是由氏族贵族转化而来的，他们利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残余垄断政权，霸占土地，奴役和压迫平民和奴隶。随着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平民的分化加剧，其中大部分平民日趋贫困，而少数人上升为新兴奴隶主。新兴奴隶主阶层

往往打着政治改革的旗号，把广大下层平民吸引到自己一方，与氏族贵族奴隶主争夺政权，展开了实质是维护还是消灭氏族残余势力的斗争，这是一场革新还是守旧、前进还是倒退的斗争。例如我国夏王朝时，氏族贵族后羿和寒浞进行复辟，颠覆了夏政权。由于他们倒行逆施，压迫平民，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新兴的奴隶主代表少康，乘机联合平民打败了寒浞，夺回了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少康中兴”。又如古希腊在公元前六世纪出现的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①就是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向氏族贵族奴隶主夺权的斗争，经过这两次改革斗争，希腊的雅典城邦“**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②在各国，这场斗争都使社会受到革命的改造，打击了氏族贵族的统治，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

这一时期，随着奴隶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激化，

^① 梭伦是雅典城邦新兴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代表，由于自由民下层的斗争，公元前五九四年，贵族被迫同意由梭伦执政，施行改革。通过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打击了氏族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这是雅典平民斗争的巨大胜利。克利斯提尼也是新兴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代表，继梭伦改革之后，在公元前五〇九——前五〇八年，他又进行第二次改革，通过这次改革，扫除了氏族制度的残余，确立了奴隶主民主制，标志着百余年来雅典平民反抗贵族斗争的胜利结束。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13页。

思想上的斗争特别是尊天命与反天命思想的斗争，也进一步激化起来。这在希腊城邦时期表现最为明显。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 580—前 550 年)是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一生积极为氏族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服务，极力鼓吹天命观。据记载，他曾纠集同党到处进行反动活动，后被人民群众烧死。他把“数”作为宣扬天命观的工具，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一切都是由“数”产生的。他说的“数”实际就是人们往日崇拜的至上神，在这里他只不过是给神披上了“数”的外衣罢了。他还提出“一切都服从命运，命运是宇宙秩序之源”的谬论，认为氏族贵族奴隶主的统治最有秩序，因而是最符合“天命”的，是天赋的。与此相反，新兴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 540—前 480 年)用他**“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①即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天命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世界“不是任何神创造的”，因此没有什么“天赋的”政权。他针对氏族贵族奴隶主把自己的法律说成是“天的意志”的谎言指出：法律就是统治者的意志，从而驳斥了氏族贵族奴隶主政权受命于天的谬论；毕达哥拉斯极力否认事物自身的变化规律，他宣扬氏族贵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60 页。

族奴隶主的意志如同数学的定理一样，是不能改变的。赫拉克利特针锋相对指出：“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事物总要在斗争中互相转化。列宁指出：“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的基本规律……是‘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①他这种思想为新兴工商业奴隶主的夺权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毕达哥拉斯为麻痹人民，还炮制了“灵魂轮回”的反动理论，他鼓吹“灵魂依照命运的规定，从一个生物体中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中”，企图让人民放弃现实斗争，听天由命，寄希望于来世。赫拉克利特指出，“灵魂就是人的性格”，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消失，从而揭穿了这种宿命论的虚伪性。他号召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不应当相信天命，应当自己制定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赫拉克利特反对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斗争，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奴隶主内部革新与守旧两派的斗争，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对于消灭氏族制度残余、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二)

在奴隶社会中期，由于奴隶制经济发展，奴隶主剥

^① 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391页。

削与压迫奴隶日益厉害，迫使奴隶和下层平民一道不断举行起义，反抗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商末大批的奴隶在牧野之战中起义，导致了商王朝的覆灭；埃及中王国末奴隶和平民起义，他们根本不信法老是“神的儿子”，法老政权是“天赋”的这套鬼话，推翻了法老的统治，把奴隶主的统治秩序打得天翻地覆，起义的奴隶和平民还焚烧了档案，夺取了奴隶主的财产，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希腊城邦科林斯起义的群众冲进神庙，血洗了祭台；公元前七三年，罗马也发生了震撼奴隶主统治的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起义的奴隶在斯巴达克这位“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①的带领下，横扫了整个意大利半岛，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灭亡。起义的奴隶们不惧“天威”，不信“天命”，用大刀和长矛批判天上的“神权”，动摇了地上的王权，都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者极力宣扬的“天命观”。与此同时，在阶级斗争浪潮的冲击下，奴隶主内部革新派和守旧派的矛盾也激化起来了。革新派要求改革政治，促进生产的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同守旧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始终围绕着政权进行，奴隶主内部“尊天命”与“反天命”的斗争也进一步深入了。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第159页。

希腊城邦雅典在伯里克利当政时期，氏族贵族奴隶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以工商业奴隶主为首的奴隶主共和国已经建立。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 460—前 370 年）为代表的“反天命”思想和以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前 399 年）、柏拉图（公元前 427—前 347 年）为代表的“尊天命”思想的斗争。斗争的中心是巩固奴隶主民主制还是恢复氏族贵族奴隶主专政。

德谟克利特是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站在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上拥护奴隶主民主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打击天命观的锐利武器。他认为世界是由一种最后不可分的微粒——“原子”和“虚空”组成的，“原子”在“虚空”中的自身运动是万物产生的原因。他还说过“神的存在是一个狡猾的臆造，实际上神是不存在的”。他从理论上论证了工商业奴隶主政权的合理性，打击了苏格拉底等人用来恢复旧制度的天命观。苏格拉底是恢复旧制度势力的思想代表，后被进步势力处以死刑。苏格拉底极力鼓吹世上一切都是神所创造和安排的，它体现了神的智慧和目的。他还自命是“神赐给雅典国家的礼物”，并且经常说他心中有一种“灵异”的声音，这是神对他的托付，公然赤裸裸地宣扬反动的天命观。二千多年后的林彪也恬不知耻地说他

有一个“特别灵”的脑袋，是“天才”、“天马”，这正好说明他和苏格拉底是一丘之貉。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对奴隶主民主制深恶痛绝，攻击这个政权是“以下犯上”，“违反了正义”的原则。他全部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反动思想，炮制了整套唯心主义的“理念论”。他宣布理念是创造一切的力量，世界是由神按照“善”的理念创造出来的，可见柏拉图的“理念”就是“天命”。为了复辟旧制度，柏拉图又提出一个“理想国”的方案。在他的理想国中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是神用金子造出来的最有天才的人；第二种是统治阶级的爪牙，是神用银子造出来的最有勇气的人；第三种是劳动者，是神用碎铜烂铁造出来的。至于奴隶，柏拉图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他说：“一旦铜铁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便要倾覆”。由此可知，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他所向往的氏族贵族专制政权，宣扬“理念”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氏族贵族统治制度，把历史拉向倒退。叛徒卖国贼林彪把人分为主宰世界的天才和只知油盐柴米的小人，目的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他的“真正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翻版，他们的“理想”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冲击下，只能彻底破灭。德谟克利特的“反天命”思想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尊天命”思想的斗争，反映了这个时期

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两条路线斗争。

在罗马共和国向帝国转变的时期，罗马的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先后爆发了两次西西里奴隶大起义和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自由民下层纷纷起来反抗元老贵族对他们土地的吞并。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统治阶级内部代表骑士和中、小奴隶主的革新派，要求打破元老贵族垄断的政治经济特权，进行一些改革。于是出现了激烈的革新与守旧两条路线的斗争。

与政治上两条路线斗争展开的同时，革新派的思想家卢克莱修(约公元前 99—前 55 年)同元老贵族的思想代表西塞罗(公元前 106—前 44 年)之间也展开了“尊天命”与“反天命”的激烈论战。首先，西塞罗为了维护即将崩溃的元老贵族政权，也同其它反动的思想家那样，把当时的政权披上一层“天命”的外衣。西塞罗宣称：人的“财富”、“权位”、“名誉”都“由天命来决定，非人力所可强求”，元老贵族的政权是“天赋”的，不可“强求”推翻。他还攻击革新派的斗争是违反了“天命”，是“叛乱”，脱离了“我们的祖宗开辟出来的正轨”。卢克莱修用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西塞罗这种天命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还对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了朴素、正确的解释。他认为由于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不了解，“因此他们把一切归之于神

灵,认为一切皆听从神灵的支配”,其实神是不存在的,所谓神就是人们心灵的想象,“这种想象在睡觉的时候更多”。既然神是不存在的,那么“万物绝不是神力为我们而创造的”,更没有什么“天赋”的政权。对于西塞罗对革新派斗争的攻击,卢克莱修用辩证的观点给予了反驳,他说:“旧的东西被新的东西排挤总得让开”,这是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论证了革新派的斗争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其次,西塞罗为了进一步麻痹人们的斗志,从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那里搬来了“灵魂轮回”、“灵魂不死”的反动思想并加以发展。他鼓吹人死后“如其灵魂是有美德而公正的,便可一直升天”,或“到一个更好的国土去”。实际西塞罗所要求人们的“美德”、“公正”,就是要革新派放弃斗争。针对西塞罗这种反动的思想,卢克莱修批判说:“如果没有了身体和人自己的话,心灵也不能单独存在”。他要求人们必须“抛弃”这种反动的思想,继续对元老贵族进行斗争。卢克莱修这种“反天命”的思想,打击了元老贵族的反动统治和西塞罗的天命思想,提高了革新派向元老贵族进行斗争的勇气,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奴隶社会中期,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奴隶主阶级的地位起了变化,他们和奴隶的

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防范与日俱增的奴隶起义，加强奴隶主专政，奴隶主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打起了“天命”的旗号，而反天命的思想越来越暗淡了。

(三)

奴隶社会末期，奴隶制度日趋反动没落，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激化，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奴隶，强烈要求推翻奴隶制度，达到自身的解放，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斗争。

在中国，春秋后期，陈国筑城奴隶奋起反抗，卫国的手工业奴隶暴动，柳下跖率领的奴隶起义队伍“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奴隶主贵族望风披靡，莫敢与战。奴隶起义不仅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而且还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奴隶主阶级的天命观。柳下跖公开宣称“不祭祖先”、不知“鬼事”，这体现了被压迫奴隶大无畏的“反天命”精神。在欧洲，罗马帝国末期，奴隶们不堪忍受残酷的奴役，多次举行起义，如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及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起义的奴隶焚烧了债券和奴隶的名单，占领了庄园，镇压了大奴隶主，并把他们的财产分给了穷人。由于奴隶起义的沉重打击，使得罗马帝国四分五裂，濒临崩溃。

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

兴的地主阶级乘时而起，生气勃勃地向奴隶主阶级展开了斗争。但是，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还要进行垂死的挣扎。因此，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尊天命”与“反天命”的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春秋时期，“尊天命”与“反天命”的斗争围绕着夺权问题展开，争论的焦点是奴隶主的政权是不是天给的，这种政权能不能改变等等。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老二，极力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一套黑货，胡说人间的一切是老天爷早就定好的，奴隶主能进行统治也是天的旨意，妄图用这种谬论来为摇摇欲坠的奴隶制撑腰打气。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先驱邓析等人，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狠批反动的天命观，为地主阶级的上台大喊大叫。邓析认为：“天与人无厚也。”就是说天不会给人以好处，当然也就不会给人政权，从而批判了奴隶主政权来自天授的谎言。

为了维护反动的奴隶主统治，孔老二拚命反对变革，大肆嚎叫要“克己复礼”。他叫嚷“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打出天才论的破旗，妄图证明奴隶主永远当奴隶主，奴隶永远是奴隶，这是不能改变的。他还鼓吹“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要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听

从天命，听从奴隶主的话，不要起来造反，不要起来夺权。邓析批判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思想，提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要求打破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另一个法家先驱史墨更进一步指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明确肯定奴隶主政权可以改变，为地主阶级夺权斗争制造理论根据，用以鼓动新兴地主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夺权斗争。

在奴隶起义的基础上，地主阶级经过长期、反复的斗争，终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封建社会。但这时刚下台的奴隶主阶级还有相当的势力，他们以十倍的疯狂，垂死挣扎，千方百计企图复辟。复辟与反复辟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中心内容，意识形态领域里“尊天命”与“反天命”的斗争也围绕着它全面展开。

在古罗马，反动奴隶主阶级代表查士丁尼在向北非新兴封建国家反攻倒算的时候，就大肆宣扬反动的天命观，利用基督教，鼓吹他的政权是“上帝的德惠”，他是代表“天”来办事的，妄图奴役人民，以实现他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目的。在中国的战国初期和中期，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孟轲为了复辟奴隶制，也大肆鼓吹反动的天命观。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荀况针对孟轲的反动观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孟轲鼓吹奴隶主的政权是“天与之”，并且说：“仁

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则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这里孟轲所说的天爵，就是仁义忠信，就是仁政。他的意思是说，修仁政是符合上天旨意的。他说的人爵就是指人间的政权。孟轲一方面认为奴隶主的政权是按照仁义忠信这一套周礼办事的，是符合上天旨意的，所以是天给的、合法的。另一方面他却恶毒咒骂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是假借“天意”篡夺而来，因“违背天命”，最终是要垮台的。

按照孟轲的主张，地主阶级究竟怎样保住政权呢？那就是要“不弃天爵”即搞仁义忠信那一套。为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反动思想。所谓尽心、知性即是要人们闭门修善，去发现自己心目中那“天赋”的仁义忠信，人类这样做了就能够“知天”，也就是和天命相通。孟轲的险恶用心，就是企图从思想上腐蚀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让他们信奉儒家思想，反对法家思想，从而为复辟奴隶制鸣锣开道。

怎样才是“不弃天爵”呢？孟轲又提出了他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就是在政治上施“仁政”，经济上复“井田”，组织上“仕者世禄”，一句话，全面复辟奴隶制。面对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现实，他知道明火

执仗搞复辟是难于成功的，所以拚命乞求于“天命”，妄图靠它改变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一旦儒家路线代替法家路线，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就会变质，复辟奴隶制的罪恶阴谋就能实现。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在我国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和当年的孟轲一样，也是耍尽各种手段，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篡夺政权。当然，他的阴谋也和当年孟轲那样，彻底破产，最后死无葬身之地，落得个可耻下场。

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荀况，为了巩固本阶级的政权，对孟轲反动的“天命”观给予了坚决的批判。首先针对孟轲“君权神授”的“天命”思想，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就是说，天就是自然界，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它有自己的变化的规律，不能主宰社会变化，更不能给予人政权，所以政权的得失与天毫无关系。

针对孟轲“修其天爵”的反动理论，荀况明确地提出了“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的主张。就是说，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不是靠天命、靠周礼，而是靠自己的努力，这样就会不断进步，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荀况还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要新兴地主阶级相信自己的力量，坚持执行法家路线，打击奴隶主复

辟活动，战胜奴隶主的复辟势力。

荀况有力地驳斥了孟轲关于“尽心、知性、知天”的反动理论。他从“天人相分”的思想出发，根本不相信人性中有天赋予的仁义忠信那一套，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精神来源于物质的思想。他还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不符合封建道德规范，因此，必须用教育的办法去改造人性。这就是说，要宣传法家思想，批判儒家思想，打击奴隶主的复辟叫嚣。荀况还主张“农分田而耕之”，反对恢复“井田制”；他提出“尊贤使能”，反对奴隶主的“世卿世禄”制度。荀况反天命的思想，全面地批判了孟轲的天命观，从思想政治上提出了一条坚持前进、反对复辟倒退的法家路线，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复辟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巩固本阶级的政权，发展新兴的封建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 *

剖析古代各国奴隶社会里“尊天命”与“反天命”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有关“天命”的论战，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思想领域里的反映。这种斗争始终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是围绕着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政权问题进行的。一切反动没落的阶级和集团都把反动的“天命观”作为维护其统治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用“天命观”为其推行守旧、倒退的路线

服务；而当奴隶主阶级失去政权时，更是拚命乞灵于“天命观”，企图借此改线篡权，实行反革命复辟。由此可见，林彪一伙的反动思想不仅源于中国的孔孟之道，而且与世界各国历史上反动派都是一脉相通的。

在古代世界，处于上升时期的一部分奴隶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都敢于对天命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但只有广大奴隶群众和劳动人民才是反天命的主力军，他们不惧“天命”，不畏“圣人”，猛烈批判反动的“天命观”，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很好的研究和总结。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历史地承担起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重任，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亿万人民群众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包括“天命观”在内的各种旧思想的大革命。历史经验证明，彻底批判和战胜“天命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认真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而奋斗。

后 记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史学革命蓬勃开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选择了世界古代史中有关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几个问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了研究、讨论。经过八十多天的努力，写出了上面的七篇文章。在写作中，我们力图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原则，希望它能成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古代史学科的一个尝试。由于我们理论水平不高，对问题研究也不够，肯定会有错误与不足之处，欢迎广大工农兵及专业工作者批评指正。

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73级工农兵学员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